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70 期
2023 年 12 月，頁 49-104
DOI:10.6243/BHR.202312_(70).0002

十七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對日關係

肖飛燕*

摘要

英國對於遠東日本的拓殖起始於十七世紀初的第二個十年。作為其殖民先鋒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613年派遣「克羅夫」號來航日本並在日建館，正式開啟了歷史上最初的英日關係。然而，這段關係在維持了十年之後就戛然而止，英國成為了歐洲四國當中來航最晚卻離開最早的國家。過往針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商館的研究極少，且主要強調其商業運營的失誤導致了英國在日事業的夭折。然而，十七世紀初的日本商館卻並非只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本設立的商業分支，而是由於東印度公司本身所具有的「準國家」特性並發展出經濟、外交、社會、軍事等多樣性功能，因而，它的失敗並不能僅僅從經濟這一個維度來探析。英國人的撤離和英日關係的中斷是由於日本商館在與母國東印度公司、在日外國勢力，以及與日本社會的多重關係上始終處於不利地位，在內憂和外患中陷入困境而又無力扭轉的結果。在這次英國人中途放棄之後，十七世紀餘年東印度公司重返日本的計畫又屢屢耽擱或者受挫，其貿易重心也逐漸向中國轉移。最終，英日關係的重啟已是兩百多年之後了。

關鍵詞：英國東印度公司、德川幕府、平戶商館；考克斯、英日關係

* 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

十七世紀伊始，隨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成立，其船隻就絡繹不絕地駛往東方尋求貿易契機。1613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的「克羅夫」號（Clove）抵達日本，並在九州島的西北部平戶藩建立了商館。[1]這成為了東印度公司開拓日本的第一次嘗試，成為了英日關係史的起點，也是在大航海時代當中初登世界舞臺的英國在遠東擴張的第一步。然而，作為繼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來航日本之後的又一歐洲國家，英國人在日本的表現卻不盡人意，在十年之後的1623 年就從日本撤離，成為四個國家當中來航最晚卻離開最早的國家。此次的撤離原本以為是暫時的離開，卻使得英日之間的正式關係從此中斷了兩百多年，直到1854 年簽訂《日英親善條約》才得以恢復。英國商館在日存續時間短暫，並且處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發展的初期，與十九世紀中葉英日關係重啟相隔久遠，這一切的不利因素使得學界對於其關注甚少；然而，作為英日關係真正起點的十七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商館的歷史是不應當被忽略的。而且，短短十年當中，英國商館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材料供後世窺探當時的情景，例如，《考克斯日記》、《亞當斯的日誌簿》和《塞力斯日本渡航記》等以及大量的信函，充足的史料和寥寥無幾的關注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於在日英國商館的研究著述主要出自英語和日本學界，基本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原始資料的整理、評注和翻譯。[2]二是以第一個來日英

---

1 為了避免語言上的重複，本文當中出現的「英國商館」在未做特別說明的情況下特指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戶建立的商館，有時根據行文的流暢也會轉變成「平戶商館」、「日本商館」或者「在日商館」強調商館坐落的地點。

2 對原始資料的整理、評注和翻譯，主要的學界成果有：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0);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 J. Purnell, ed., *The Log-book of William Adams, 1614-19: with the Journals of Edward Saris,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Japan, Cochin China, Etc* (London: The Eastern Press, 1916); Ernest Satow, ed., *The Voyages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 1613*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00). 1991 年，古籍專家法林頓（Anthony Farrington）彙編了商館相關資料，參見 Anthony Farrington,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1).

國人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 1564-1620）為原型的小說、傳記類以及人物研究。[3]三是對於英國商館的整體研究，但基本上是鑲嵌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發展史、英日交往史、日本的對外關係、日本地區發展史等的宏大敘述當中，而將商館作為唯一對象的著述甚少，且大都集中於經濟領域的論述。[4]整體而言，此前針對英國商館的為數不多的研究更多是集中於經濟層面，僅從經濟的和商業的角度來探討和反思商館的失敗，其他方面只是作為背景而略有提及。

本論文旨在掙脫過往研究的桎梏，強調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本設置的英國商館並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商貿機構，而是發展出多樣的功能並承擔了多重的使命。因此，英國在日事業的夭折並不僅僅是由於商業貿易的失敗所致，而是同時遭遇到各方面的困難，且經濟運營的失利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因素觸發的。通過探討英國商館內部情況，英國人與在日多方勢力之間的關係——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以及中國在日勢力的關係——以及與日本上至幕府下到普通民眾之間的關係，進而挖掘商館在這多重關係當中所發展出來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宗教、文化

---

3 以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為原型的小說、傳記類以及人物研究，主要的學術成果有：Richard Hildreth, *Japan As It Was and Is* (Boston: Phillips, Sampson and Company, 1855)；William Dalton, *Will Adams, the First Englishman in Japan: A Romantic Biography* (London: Cassell, Petter and Galpin, 1868)；Richard Blacker, *The Needle Watcher: The Will Adams Story, British Samurai* (Rutland, Vermont and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Inc., 1973)；William Wilson Grantham and Alderman J. Bate, etc., *William Adams: The Pilot-Major of Gillingham, the First Englishman Who Discovered Japan* (Gillingham: Mackays, 1934); 內山舜《アダムスと家康》（東京：磯部甲陽堂，1926）；石一郎，《海のサムライ》（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3）。

4 對於英國商館的整體研究，主要的學術成果有：James Murdoch, *A History of Japan (Vol II): During the Century of Early Foreign Intercourse (1542-1651)* (New York: Greenberg, 1926); 村上直次郎，《貿易史上の平戸》（東京：日本学術普及会，1917）；宮永孝，《日本とイギリス——日英交流の 400 年》（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大陸學界主要是針對英國東印度公司整體的關注，對於早期的在日英國商館最多只是略微提及、一筆帶過，甚至完全不出現在論述當中。目前對於英國商館的關注和研究最值得提及的要屬學者張蘭星和劉欽的論文，他們是打開這個領域的先驅。張蘭星和劉欽的研究成果，詳見後文說明。

和社會等功能和職責。這些關係以英國為中心彼此交錯，相互影響，牽一髮而動全局；然而也正是對於這些關係的處理不善，不能勝任所賦予的複雜職責而使商館深陷重重困難，英國人最終離去。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努力的半途而廢，一定程度上使其之後的返航計畫遭遇重重阻礙，這正好與堅守日本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形成鮮明對比。英日之間的初次相遇發生在德川幕府創立初期，但是他們之間的再次重逢已是兩百多年之後的幕府末期了。

一、英國商館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關係

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初對於開闢日本市場是充滿信心的，若能獲取日本的白銀，可使英國在亞洲內部的港口間貿易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完美循環，進而支撐英國與亞洲的遠程貿易。第一個來日的英國人亞當斯寫道，「尊敬的倫敦東印度公司將沒有必要從英國運出許多的資金，因為日本擁有充足的金和銀，建立了交通聯繫，他們（英國人）將會有充足的資金來滿足他們的需求」。[5] 然而，現實是英國商館並未從日本獲取大量的白銀以供應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運營，而這又是由於在商品的選擇、資金的供給和人員的配置各方面，東印度公司都未給予英國商館強有力的支持。甚至從1617年到1620的三年間，倫敦總部以及萬丹（Bantam）商館與日本商館之間的斷航使得後者孤懸一地，最終陷入絕境。不僅商品、物資和資金等客觀條件制約著，甚至阻礙著，商館的良性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經營這項在日事業的人，他們的個體素質能力、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整體的組織秩序，也限制了英國在日事業的拓展。從被經營的商品到經營商品的人，雙重的問題使得東印度公司在日事業的失敗成為必然。

（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支持不足

從最開始，東印度公司對於在日可售商品就定位錯誤，一心想要將英國本土所產的以呢絨寬布（broad cloth）為主的商品銷售

[5]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p. 42.

到日本，卻長久無法找到市場。寬布被錯誤地認為會得到日本人的接受，但實質上這只是一種盲目的樂觀，因為日本消費者對於寬布作為衣料並沒有多大興趣，只是一些人會將其點綴於風衣外套之上。寬布在日本最大的用處則完全出乎英國人的預料，日本人會把寬布用在裝有武器、長矛、日本刀或者火槍等的盒子，或是作為遮蓋相關物件的覆蓋物上。[6]其他商品也由於西葡荷的競爭在日本無從尋求充足的市場空間，或者只能在價格戰中不斷降價獲取微薄的利潤。另一方面，在日本供不應求的生絲等中國商品卻是東印度公司無法充分提供的。日本所需和英國所供之間形成了無法彌合的差距，致使英國商館在日經營始終無法有起色。後來東印度公司萬丹商館主席喬治．波爾（George Ball）曾公開指摘英國供應給日本商館的貨物完全沒有順應日本社會和市場的需求，造成產品一度滯銷而入不敷出，「如果它（在日商館）可以被供給它本應需要的產品，不是來自於英國的商品，而是那些來自於世界這些部分的產品的話」，商館是可以取得巨大成功的。[7]他所說的「世界這些部分」是指船隻在前往日本的途中所經過的阿拉伯、印度、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等地，而那些日本「需要的產品」則是產自這些地方的香料、胡椒、絲綢、生絲之類的商品，而不是現在囤積在平戶商館的英國制呢絨布匹以及那些毫無用武之地的玩物，像是「陶罐、桌簿、細線、刀具、眼鏡、地圖、畫作、鏡子以及其他像這些一樣中看不中用的無價值物品」。[8]

一方面，來自於東印度公司的物資和資金供給不足始終限制著英國商館的發展。本來預想日本商館可以成為公司的一個銀庫，能有效解決受到貴金屬出口限制政策的倫敦總部的困局，因而東印度公司自然在對日資金供給方面並不會十分寬裕。首航船長塞力斯（John Saris, c. 1580-1643）留給平戶商館的啟動資金是七千

---

6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311.

7 Anthony Farrington,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vol. I, p. 665.

8 Anthony Farrington,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vol. I, p. 665.

英鎊，[9]他認為他給商館的錢物足以讓館長考克斯（Richard Cocks, 1565-1624）「充分」開展在這些地方的活動。[10]然而實質上，「東印度公司提供的經費勉強維持日常開銷，如果還要採購貨物，幾乎是不可能的」。[11]不僅如此，這個商館在最初建立時承擔了諸多任務，不僅要開闢日本市場，還一度想通過對馬島開拓朝鮮貿易，並同時保持著對華的關係，又不時得派船下南洋採購，再加上日本社會禮尚往來的習俗更是一筆巨額的開支，各方面的經濟壓力使得商館一直捉襟見肘。1617 年到 1620 年間，將近三年左右日本商館與萬丹，乃至於與英國本土的斷航給了英國商館以致命一擊。只是在奄奄一息之際，英、荷東印度公司的暫時結盟才讓英國重新重視平戶商館的存在，將其設為聯合艦隊的停靠港之一，從而獲取聯軍在海上所劫掠的諸多物資。可是，為了補給有時人數多達上千人的艦隊，還有物資提供、商品採辦以及對日本各級官僚貴族的饋贈，這一切瑣碎且繁雜的事務使得日本商館並未真能從中獲利多少，再加上不利於英國人的分配比例，英國商館很難成為英荷聯盟的實質受益者。[12]在外部環境尚且寬鬆的時刻，這種經營還能勉強維持下去，然而一旦幕府政策收緊或是來自於商館所在地平戶的領主松浦氏的壓力加重之時，英館的在日事業就如危樓一般搖搖欲墜。

另一方面，人手短缺一直困擾著商館，這使小小的在日商館疲於或無力應對東印度公司的要求。[13]在到達日本短短的三年之

9　宮永孝，《日本とイギリス──日英交流の400年》，頁28。

10　Anthony Farrington,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vol. I, p. 122.

11　張蘭星，〈17世紀初的英日貿易及其失敗原因〉，《史林》，2012：3（上海，2012.6），頁176。

12　村上直次郎，《貿易史上の平戶》，頁57。

13　1613 年隨「克羅夫」號而來抵達日本的有七十人，其中的七名商人成為隨後在平戶落戶的英國商館的常駐商務代表。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Cocks）升任首席商務代表即館長，其他六位分別是坦皮斯特．皮科克（Tempest Peacock）、理查德．威克漢姆（Richard Wickham）、威廉．伊頓（William Eaton）、沃爾特．卡瓦登（Walter Carwarden）、埃德蒙．賽耶斯（Edmund Sayers）、威廉．尼爾森（William Nealson）以及剛剛向德川家康請辭而與船長塞力斯談妥加入到英國商館的威廉．亞當斯。此後，1615 年來航日本的英船「霍齊安德」號（Hoziander）

內，英國人就構築出由平戶商館本部，兩家分館和十一家代理店組成的商業網絡，期望能夠深入打進日本的主要市場當中。[14]除此之外，按照塞力斯的部署，無論開拓對華還是對朝的通商關係都需要有專人來打點。更何況，由於東印度公司所供商品並不符合日本市場，英國商館想要在日本站穩腳跟還需定期選派商員南下進行額外且耗時甚久的採購，因而商館的規劃與人手不足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例如，建館之初就派遣館員賽耶斯（Edmund Sayers）前往北大年和暹羅採購生絲和其他商品，1614年3月又派皮科克（Tempest Peacock）和卡瓦登（Walter Carwarden）攜帶著七百四十英鎊前往交趾支那採辦生絲和絲織品；[15]1615年和1616年兩次派亞當斯領航「海洋探險者」號（Sea Adventure）前往暹羅，將在日沒有銷路的羊毛寬布製品帶到當地售賣，並採購生絲以及其他東南亞產品，第二次航程的收穫「是平戶商館進行的所有航行中最成功的一次」。[16]由商館購入的「海洋探險者」號就代表商館分別在 1614年、1615年、1616年和1618年南下暹羅進行物資購入，在最後一次的出航中，由於嚴重受損而被拋棄在暹羅沿岸。而且，在商館經營的十年當中，還不斷有商員離開或病逝，狀況因此更加困窘。皮科克和卡瓦登下南洋採購物資時，在交趾支那遭到當地人的攻擊而死於非命；[17]一直對於薪酬不滿的威克漢姆（Richard Wickham）在1618年就離開了平戶前往南洋群島；[18]

留下了兩名人員約翰・奧斯特維克（John Osterwick）和理查德・哈德森（Richard Hudson）。ジョン・セーリス著，村川堅固譯，岩生成一校訂，《セーリス日本渡航記》（東京：雄松堂出版，1999），一六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頁227。

14 劉欽，〈日英早期通商研究（1613-1623）〉（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8），頁75。平戶商館本部，江戶和大阪分館，以及直轄於平戶總館的長崎和對馬的代理店，和直屬於江戶分館的駿河、蒲賀、三崎和大幾四家代理店，以及直屬於大阪分館的京都、伏見、堺、大津和鞆津店。

15 宮永孝，《日本とイギリス――日英交流の400年》，頁28。

16 C.J. Purnell, ed., *The Log-book of William Adams, 1614-19: with the Journals of Edward Saris,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Japan, Cochin China, Etc.*, p. 173.

17 C.J. Purnell, ed., *The Log-book of William Adams, 1614-19: with the Journals of Edward Saris,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Japan, Cochin China, Etc.*, p. 166.

18 Hiromi T. Rogers, *Anjin - The Life and Times of Samurai William Adams, 1564-1620. As Seen Through Japanese Eyes* (Kent: Renaissance Books, 2016). p. 244.

尼爾森（William Nealson）一直酗酒而造成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於1620年3月在平戶去世；[19]奧斯特維克（John Osterwick）在尼爾森重病期間也是病重纏身；[20]亞當斯在1620年5月16日過世，而他的離世使得英國商館失去了和日本社會之間最重要的聯繫。[21]英國商館不得不採用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不僅雇傭當地的日本人來經營陸續開設的代理店，還被迫大膽地啟用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天主教徒來料理諸如長崎的事務。[22]儘管多元化的用人政策緩解了商館人員不足或者無人可用的窘境，但是終究還是限制了商館在日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而且如後文所述關於英國商員與日本雇員之間的不睦，也使進一步的發展受到了更多的局限。

在十七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一方面在亞洲面臨多重競爭，不僅在印度與波斯等地與葡萄牙爭奪貿易主導權，又在東南亞一帶與荷蘭展開角逐，這些海外競爭不斷地在消耗著公司的財力、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新生的東印度公司不僅要面對英國內戰的政治亂局以及國內競爭者對其壟斷權力的持續挑戰，而且還因為其公司融資模式等問題持續地陷於資金不足的窘境當中。本來一度被寄予希望的平戶商館最終卻只能依附母體而不能獨立發展，當早期還不成熟的東印度公司暫時無力持續支持其遠東計畫的情形下，在東印度公司的整體策略中，日本成為了棄子，以

---

19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321.

20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313.

21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321.

22 在葡萄牙勢力控制之下，天主教勢力強盛的長崎一開始便聘用了日本信徒安德裏亞（Andrea），之後又陸續雇傭了一些「獨立外國商人」來管理英國的倉儲，如，西班牙人胡安．德．利瓦納（John de Livana）、義大利人達裏安．瑪裏納（Damian Marina）、葡萄牙人喬治．杜魯瓦（George Durois）、而後荷蘭人梅爾希奧．範．聖沃爾特（Melchior van Santvoord）。而對馬的代理店則是由一名叫作喬治．杜裏斯的葡萄牙人來照管。當然，採用西葡人員以及親西葡的日本人來為商館服務，必然存在著一些風險，然而對於客觀情況的考量又不得不走這樣一步險棋。武藤長蔵，《日英交通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78），頁44。

保全其在印度的利益。

（二）英國商館的人員問題

除了人手緊缺之外，現有人員也是問題叢生。商館領導層和決策層核心人物的能力和素質問題，以及彼此之間關係的不太融洽，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商館在商業經營和外交策略等方面的失策，陷入一種被動和不利的地位。作為商館奠基者，也是英日正式貿易開啟者的船長塞力斯，有著個性剛愎自用，行事專斷獨行的傾向。塞力斯根據來到日本之前在萬丹商館的工作經驗撰寫了一份「在日購買與銷售商品的觀察」，推薦在日可銷售羊毛和鉛，「如果沒有它，任何英國商館都不可能正常運作，到天鵝絨，再到鍍金的羽毛，女性的化妝品、掛毯和繪畫」。[23]而1613年12月5日當塞力斯從平戶啟航返程後又重新整理的清單中，除了一處明顯的添加：「陶罐」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改變。[24]顯而易見，這份幾乎未曾改動的產品目錄，不僅表示他在日停留六個月的時間當中並沒有切身履行公司囑託給他的任務，親自調查日本市場商品售賣的情況，尤其是與英國處於競爭關係的葡西荷對日貿易的供貨情況，而且也說明他並沒有接受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亞當斯為他提出的商品選擇建議。尤其是他仍舊堅持認為英國產呢絨寬布在日本是擁有市場的，只是因為在日的英國人自己並沒有經常穿著寬布製成的衣物起到帶頭示範作用，引領這種新的時尚，反倒是入鄉隨俗地模仿日本當地人身著絲織品，才使得寬布的銷售止步不前庫存囤積。「希望（我的）一些好的建議（儘管有些遲了）能夠起到作用，我希望我們可以更加主動地使用和消費我們自己國家的產品。因此，我們才能更好地鼓勵和吸引其他人去購買和消費」。[25]因此，在「克羅夫」號之後，1615年「霍齊安德」

---

23 Timon Screech, "'Pictures (The Most Part Bawdy)': The Anglo-Japanese Painting Trade in the Early 1600s," *The Art Bulletin*, 87: 1 (March, 2005), pp. 50-51.

24 Timon Screech, "'Pictures (The Most Part Bawdy)': The Anglo-Japanese Painting Trade in the Early 1600s," p. 51.

25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p. 165.

號（Hoziander）以及1616年「托馬斯」號（Thomas）和「安德威斯」號（Advice）來航，仍然運來了大量英國產的呢絨布和印度產的棉布。總體而言，塞力斯對日銷售商品的選擇失誤、商館的選址不佳、[26]與在日的關鍵人物亞當斯之間的關係疏離（詳細後述）等一連串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英國在日事業開局不利，從而根基不穩。

作為商館的首席商務代表，亦即商館館長的考克斯，在性格上卻剛好和塞力斯大相逕庭，他缺乏一種果斷和堅毅的氣質。在涉及到商館的諸多重大決定上，與其說他是一個決策者和領導者，還不如說他只是一個追隨者，很難窺見其個人的判斷。這從他與船長塞力斯的關係、與亞當斯的關係以及與華人李旦（?-1625）的關係可見一斑。他對於塞力斯所下達的命令基本上亦步亦趨，無論是盡可能在日本為「克羅夫」號所運來的英國呢絨製品打開市場，還是在日本其他重要市鎮建立分館和代理店，抑或派遣使者打開朝鮮和琉球市場，或者是派館員前往北大年和暹羅採購生絲、皮革和蘇木等，考克斯按照塞力斯所制定的方針和繪製的藍圖在逐步採取措施。[27]帕斯克．史密斯（Paske-Smith）甚至認為考克斯並不是做商人的材料，他理應違背塞力斯的意志將商館移到浦賀港，這樣不僅遠離荷蘭人的競爭，而且還接近他們最大的市場。[28]但是考克斯卻一直執著地在執行著長官的命令。其次，此後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著深受德川家康（1543-1616）信賴的亞當斯為其建言獻策、斡旋英日之間的關係。無論是遣使前往江戶和駿府，還是考克斯親自前往幕府覲見德川秀忠（1579-1632）的時候，亞當斯必然是隨行前往。亞當斯不僅僅是作為翻譯和參謀，而是英日雙方的一個紐帶，為英國爭取更多特權或為英國辯護。「有

---

26 塞力斯婉拒了德川家康以及亞當斯在江戶附近的浦賀港設館的建議，執著於在西南平戶藩落戶，致使商館遠離日本的政治中心以及主要市場。參見加藤三吾，《三浦の安針》（東京：明誠館書店，1917），頁230。

27 宮永孝，《日本とイギリス——日英交流の400年》，頁26。

28 Montague Paske-Smith, *Western Barbarians in Japan and Formosa in Tokugawa Days, 1603-1868* (Kobe: J. L. Thompson & Co. Ltd., 1930), p. 59.

時候他（亞當斯）成為了整個英國在日事業的真正支柱」，[29]而考克斯卻只是扮演一個配角的角色。而且，在開拓中國商路方面，考克斯將建立與中國通商關係的所有希望幾乎完全交託給了中國人李旦，對於他的信任整整持續了十年。直到最後，考克斯對於中國情況的認識也是建立在李旦給他描繪的圖景當中，喪失了自己的判斷，從而將自己變成了李旦手中的一枚棋子。1623 年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委員會譴責道，「因為你（考克斯）單純簡單地信任了中國人李旦，結果卻是長期被他所欺騙」。[30]在涉及到英國商館在日開拓事業諸多方面中，作為館長的考克斯缺乏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對事態的正確判斷，不僅未為商館制定正確的發展策略，還一度致使商館誤入歧途而大傷元氣。

作為歷史上第一個來日的英國人，也是英日關係當中極為重要的仲介者亞當斯，因為長年生活於日本而與母國失去聯繫，也與在日的西葡荷人都有所交往，這些過往經歷使他與後來的英國人間始終存在著一種距離感。初來乍到的英國人對於這個已然在日本社會立足、深受德川家康器重，且與英國的敵國來往甚密的亞當斯總是心存疑慮。英國同胞對於一副日本本土打扮、能講流暢日語，並且「熱情洋溢地讚頌這個國家（日本）」的亞當斯心懷疑慮和不安，[31]認為其長年生活在日本人當中「深受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化」了（“a naturalised Japanner”），很可能並不會和英國人同心同德。而且 1600 年時，亞當斯乃是乘坐荷蘭船隻「利夫德」號（De Liefde）前來日本，並且與倖存的荷蘭人以及 1609 年來日建館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為荷蘭人爭取了諸多權利，「為他們（荷蘭人）爭取到西班

---

29 Ilza Veith, “Englishman or Samurai: The Story of Will Adam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5: 1 (November, 1945), p. 23.

30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341.

31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p. 56.

牙和葡萄牙在日本五十年、六十年都未曾得到的特權」。[32]亞當斯為荷蘭人效力的行為遭到了其同胞的譴責，認為他已經「全盤荷蘭化」了（altogether Hollandized），「相較於其英國人的身分，他（亞當斯）更傾向於荷蘭人和日本人一方」。[33]不僅如此，亞當斯還為曾經想致他於死地的西人、葡人出面，「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所有談判都經過我的手」。[34]在1613年來航的英國人眼中，尤其是與亞當斯在諸多方面不和睦甚至產生爭執的船長塞力斯心中，正是亞當斯複雜的背景和多重的關係模糊了其英國人的身分進而稀釋了其對於母國的情感。因而，塞力斯從一開始對於亞當斯是缺乏信任並充滿猜忌的，而雙方之間的疏離使得亞當斯此後未能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在日事業當中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和最大價值。塞力斯臨行前囑咐館長考克斯，「亞當斯先生只適合做船隻的船長，以及，當你並沒有海上的任務交給他時，就讓他在宮廷當中作為翻譯……否則盡可能少讓他做事」。[35]塞力斯甚至認為如若沒有合適亞當斯的職位和任務時，也可以打發他離開商館，任他去別處，為其他國家服務。儘管館長考克斯在之後與亞當斯的相處中越發感受到亞當斯對於商館的重要性，然而，亞當斯從1613年11月24日與塞力斯商定為英國商館效力兩年而後延長至1616年，之後並沒有再正式與公司續約，他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恢復其相對獨立的身分。最終，1620年5月亞當斯的離世令英國商館的處境變得越發艱難，考克斯不禁哀悼到，「對於失去像船長亞當斯這樣一個人，我情不自禁地傷悲，他曾受到兩代將軍的青睞，這是任何一個在世界這些地方的基督徒都未曾獲得過

---

32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p. 42.

33 皆川三郎，〈William Adams 研究——日英における評価と人間 Adams——〉，《英学史研究》，7（東京，1974.9），頁 28。

34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p. 43.

35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p. 78.

的。」[36]

除了這三位在日商館重要「關係者」彼此間的關係外，在對於商館其他人員的管束上，缺乏明確而嚴格的規範和紀律進一步增加了內部的矛盾。廣義而言，英船上的人員也應被視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本的整體存在。船隻在平戶的停港時間往往較長，由於每次英船抵達日本之後，船長等人都需要前往幕府參見將軍、敬獻禮物並獲得朱印狀，來回耗費時日，而且船隻還需要等待合適的季風季節才能返航，所以這就意味著，在平戶當地出沒的以船員為主的各色英國人在當地並不是來去匆匆的過客，而會與平戶當地社會和民眾有許多的交集。然而，這些人員的管理成為東印度公司揮之不去的夢魘。首先，這些來日商員，尤其是大量船員多是具有冒險精神之人，其中的許多人是來源於社會底層，或是無法融入到社會當中，被社會所排擠和拒斥的人員。正是這些被其母國社會認作是社會的閒散人員甚至是「渣滓」的人填充了這一艘艘遠航的商船。館長考克斯稱他們「不可理喻」並「難以駕馭」，「大多數英國船隻都是由這樣一些船員所駕駛，他們的朋友都著急地想要擺脫他們，將他們送出去，希望這些漫長的旅程能除掉他們」。[37]來日英國人身上普遍存在紀律渙散、好逸惡勞、怠忽職守、中飽私囊，或者盜竊、醺酒滋事、打架鬥毆，甚至是叛逃的現象。這些人不僅很難為商館的商業拓展做出積極貢獻，反倒會拖累商館前進的腳步，降低商館的經營效率，增加商館的運營成本，造成實質上的財政負擔，直接導致其經濟虧損。而且，這些人的出現和存在還會破壞商館在日的形象和口碑，使商館陷入一種不友好、不祥和，甚至是排斥與敵視的社會氛圍當中，間接地損害英國商館的經濟利益。其次，海上一連行進數月之久的航船以及遠離故土且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港口以及商館，這些都是王權鞭長莫及的地方。英王通過「委任狀」將權力

[36]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291.

[37]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294.

授予東印度公司，而從東印度公司到艦隊司令進而到館長手中被不斷拉長的權力鏈條，這層層的代表和時空的距離使得權力本身遭到削弱，權力在行使過程中也會引發混亂。在理論上「船長或者艦隊司令在海上、商館館長在陸地上分別擁有最高的權力」，[38]然而在現實中，雙方的職責其實很難分割清楚，進一步造成人員管理上的困難。再加上即便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於船員的管理採取嚴刑峻法的手段，但總是適得其反，[39]不僅未能有效制止違規亂紀，還會釀成船隻上的譁變，或者促使船員到港之後逃跑甚至投靠到敵國。[40]再者，與西葡將傳教事業和商業開拓、殖民擴張相互融合所不同的是，宗教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和商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邊緣的，從而宗教情感和信仰所能誘發的道德自覺和行為自律在英國的海外群體當中也是微弱的。[41]無論是宗教

---

38 James Lewis, "'Nifon Catange or Japon Fation':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PhD thesis from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04), p. 256.

39 在東印度公司的航海日誌當中所提到的懲罰方式五花八門，例如，禁食、鞭笞、懸吊在桅杆上、戴上有鐵鐐的足枷、浸沒水中、在船底拖曳、拴在起錨機上、將手釘在桅杆上或者關在夾板之下等。諸如盜竊、鬥毆、以下犯上、辱罵長官、私自上岸或者滯留不歸、都會遭受體罰。除此之外，將當事人和肇事者處以絞刑的事例也時有發生，而「死刑則只是適用於最為嚴重的罪行，例如逃跑和謀殺」。James Lewis. "'Nifon Catange or Japon Fation':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p. 272.

40 例如，乘坐首航英船「克羅夫」號的七個水手在1613年英國商館建館不久就逃離到長崎的天主教堂躲藏起來，怕被英國商館的人找上門將人討回，又在耶穌會士的安排下被運送至馬尼拉暫且安頓。ジョン・セーリス著，村川堅固譯，岩生成一校訂，《セーリス日本渡航記》，一六一三年十月二日～十月十六日，頁199-209。

41 公司為船員和商人們提供牧師的宗教服務並非是一種被嚴格遵守的規定或傳統，只是一種「間歇性的」和「不連續的」現象，有些艦隊會配有牧師，有些則沒有。根據學者路易斯（James Lewis）所言，在1620年之前，也就是英荷共同組建「英荷防衛同盟」艦隊之前，並沒有牧師造訪商館，於是1615年來航的「霍齊安德」號、1616年來日的「托馬斯」和「安德威斯」號，以及1617年再次來港的「安德威斯」號上也就沒有牧師的身影。來訪過平戶商館並在史料中留下有記錄的傳教人員只有兩位，一位是從1620年7月到當年12月份隨「皇家詹姆斯」號（James Royal）來日的神父帕特裏克・科普蘭（Patrick Copland），另一位是乘坐「帕爾斯格羅夫」號（Palsgrove）從1620年8月到1622年10月之間在日的牧師阿瑟・哈奇

信仰還是道德意識，英國人都是相對薄弱甚至是缺失的，這就造成在紀律監控和道德約束雙重失效或執行不力的情況下，英國商館內部的秩序一度失控。

二、英國商館與在日外國勢力之間的關係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本既遭受著由內而外的破壞力，還同時承受著由外向內的各種壓力。在這兩種作用力的相互對沖和擠壓之下，在內憂外患的處境當中，英國人最終敗下陣來，慘澹收場。

（一）英國商館與西葡在日勢力的對峙

英國在日所要面對的威脅，首先是來自於羽翼豐滿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在日勢力。在西葡的眼中，英荷的利益是捆綁在一起的，西葡的目標就是要在後來者英荷的勢力還未在日本生根發芽之前將他們驅趕出日本，為此也是不遺餘力地針對英國。

與形單影隻的英國商人只能靠自己來拓殖商業網絡和經營人際關係不同的是，西葡勢力在日本的拓展始終是建立在商人與傳教士通力合作的模式之上，「財神」（Mammon）和「上帝」（God）攜手並肩，形成了「商教一體」的聯手策略，相互支撐，彌補彼此的弱勢。傳教士們之所以能夠介入貿易當中，最直接是技術上的原因，語言的障礙使得日本商人與西葡商人之間需要借助傳教士作為翻譯；傳教士們自身的學術造詣、文化修養，以及品德涵養也被交易雙方所信任，願意以他們作為中間人來訂立合同契約；對於商人而言，作為基督徒，他們也渴望得到主的佑護，使得他們的海上貿易能夠順利無阻。而且，在西葡修會當中，耶穌會更是在某種程度上主張「以商養教」這種因地制宜的教會發展模式，直接投資於澳門——長崎間的大船貿易中。傳教

（Arthur Hatch），哈奇神父在日時間雖久，而且也被公司委託「在船隻停靠平戶期間作為英國商館的牧師」，但是大部分時間他是待在平戶和馬尼拉的航船之上作為隨船而非駐地牧師。Anthony Farrington,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vol. II, p. 1557.

團體與商人團體之間建築在不相矛盾的利益訴求之上的親密合作，使得最終的結果不僅是有利於傳教團體，也極大造福了在日經營的商人群體。不僅如此，由於宗教的使命和熱忱，傳教士們願意走進日本社會，接觸日本人，從日本社會的上層將軍、大名、幕臣、藩士到下層的普通百姓，甚至是被稱之為「穢多」、「非人」等賤民階層，[42]他們的足跡「踏至半個以上的日本國土，精通（日本的）國內情況，留下了種種的業績，頻繁地傳送報告……在耶穌會士當中，立足於信仰，有著強烈的熱情和堅強的意志，勤勉地勞作，並富有教養的人非常多」。[43]承擔耶穌會商業職責的管區代表（Procurator）「長年留在日本，不僅僅對於言語和各種風俗，而且對行市都很精通，耶穌會管區代表是真正有能力而且可以信賴的仲介者」。[44]而西班牙的聖方濟各會、聖多名我會、聖奧古斯丁的托缽僧修會比耶穌會更加專注於社會底層，這也與耶穌會偏向於上層社會的傳教路線相輔相成。整體上，兩派修會涵蓋了日本社會的多個層面，形成相互支撐和互相補足的作用。正是有了這些在素質、德行以及學識上都遠遠高於同國商人的傳教士們的幫助和支持，「南蠻」商人才能在之前取得在日的貿易優勢、甚至是商業壟斷地位，而之後使得「紅毛」商人在一時之間也無法與其比肩，更無法輕易將其撼動。[45]所以，「商教一體」既是傳教士的佈道方式，也是葡西商人的貿易策略。

葡萄牙在英國來航日本之前的半個世紀當中幾乎壟斷了對日貿易，而這個壟斷的基礎就是其在澳門得以立足，從而長年經營

---

42 「穢多」、「非人」處於日本社會最底層的賤民階層，生命權無從保障，也被受世人的冷眼和侮辱。

43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改訂增補）》（東京：六甲書房，1974），頁703。

44 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93-94。

45 「南蠻」，最初為東南亞一帶各國人的泛稱，之後則為在這一地區建立了勢力範圍或殖民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代稱。「紅毛」則指來自於其他歐洲國家之人，尤其是荷蘭人以及之後的英國人。不過在日本，「南蠻」一詞要比「紅毛」使用得更加廣泛，也更為人知曉。

著中日之間的大船貿易，這是作為後來者的英荷無法輕易撼動的。由於英荷船隻來航日本，東亞水域的情勢變得緊張而且難以預料，為了安全起見，葡萄牙方面也會特意派出戰艦來為澳門大船保駕護航確保澳門——長崎之間的貿易能夠順利無阻地進行。之後，為了擺脫英荷船隻的尾隨，從1618年開始葡人放棄了體積龐大、行動不便、武裝薄弱的大帆船（carrack），[46]採用靈活機動的小型帆船（galliot）所組成的船隊來經營澳門——長崎之間的貿易，這也是葡人面對挑戰和危機做出的及時應變策略。[47]不僅如此，葡萄牙方面也與幕府積極溝通，希望以大船的安危為重，推動幕府採取反英荷的舉措。譬如澳門市議會就曾在1621年的時候致信幕府閣老們，希望幕府能夠採取措施驅逐荷蘭船隻，從而保障來自於澳門的大船可以順利抵達長崎。[48]畢竟大船貿易是幕府的

---

46 「澳門大船」（英語中稱作 Great Ship from Amacon，葡語叫作 Nao do trato）一般是指載重在1,200噸到1,600噸之間的大型帆船，而2,000噸以上的帆船也並不少見。葡萄牙的大帆船在當時世界上是體積最大的帆船，只有西班牙在馬尼拉——阿卡普爾科之間行駛的大帆船（Manila galleon）可以與之媲美。為了減少來自於中國的商品在新墨西哥對於西班牙本土所供應的商品的競爭，1593年西班牙當局曾一度規定馬尼拉大帆船的載重應該控制在300噸以內。然而，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大帆船的規格不斷地增加，從小型和中型規制升級為大船甚至巨船，「17世紀，載重達到1,000噸；18世紀上升為2,000噸。這些帆船寬度極大，船頭和船尾甲板平闊，看上去像極了一座座海上城堡」。多洛斯・弗爾克（Dolors Folch）著，戴娟譯，〈馬尼拉大帆船〉，收入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編，《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第10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18。Galliot（有時寫作 galliota或者gallivat）裝有帆和槳，「其最大的特點是長三角帆（Lateen-sail）、兩排槳和兩根桅杆，而且機動性很強。其噸位通常在200-300噸之間，長崎經常見到這種船。日本人對小帆船印象深刻，日語『小型ガレー船』可能就是指這種船」。參見張蘭星，〈初探16-17世紀澳門——長崎航線的葡萄牙巨船〉，收入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編，《絲路的延伸：亞洲海洋歷史與文化》（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209。

47 C. R. Boxer, ed.,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59), p. 14.

48 「最近有十三艘荷蘭海盜船在公海上猖狂肆掠，以致於我們無法使用大黑船，而只能借助小船。這對於我們而言是個巨大的麻煩，如果您能命令荷蘭人離開平戶，我們將會感激不盡。因為他們只是海盜而已，沒有別的國家允許他們將船停靠在他們的港口，因此他們才只能聚集在平戶港。」參見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435.

重要利益所在，因而尤為關切，嚴禁英荷對其的破壞，「（荷蘭人和英國人）需要注意他們不要插手來自澳門的大船，因為皇帝（將軍）在她身上有很多的投入」。[49]尤其是長崎的多任奉行，無論是長期佔據此位置的長谷川一族（長谷川波右衛門重吉、長谷川左兵衛藤廣〔1567-1617〕、長谷川權六藤正〔?-1630〕），還是之後的竹中采女正重義（?-1634）、曾我又左衛門古祐（1586-1658）等成為了葡商利益的維護者，斷不會讓英荷之人為所欲為。

而且，要維護住長崎貿易的穩定，就必須保證對於在日所售商品之來源地的壟斷，這就意味著葡萄牙要捍衛住其在澳門的特殊地位，因而澳門的葡萄牙商人、行政官員、傳教士、信徒們形成了一個團結的社區，共同抵禦來自英荷的挑釁。對於打開中國市場，荷蘭人文武兼用，先是在「1601、1604和1607年曾多次試圖直接去廣州經商，繞開葡萄牙的據點澳門」，[50]想避免與在澳門盤踞著的葡萄牙勢力正面衝突，另闢蹊徑來與中國通商。荷蘭人也「試圖在福建這個東南沿海省份登陸，對那裏的人民許下各種各樣的願，那就是，他們會讓他們做生意發財，他們會把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趕出澳門以及西班牙人趕出菲律賓，就好像中華帝國的威力還需要荷蘭人和他們的船隊來幫忙似的」。[51]但是，澳門的耶穌會神父們竭力說服中國人，「荷蘭人只是以經商為藉口，企圖在他們的國家（中國）首先尋求一個立足之地，而後就是將一切可以移動的東西搬運走，洗劫一空」。[52]葡萄牙人以武力及外交等手段瓦解了荷蘭的企圖，使之鎩羽而歸。不甘心的荷蘭人一方面以海盜的作風開始掠奪來往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中國人的船

---

49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106.

50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顧良、施康強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世界的時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256。

51 利瑪竇（Matteo Ricci）、金尼閣（Nicolaus Trigautius）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上冊，頁196。

52 Robert Markley,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22.

隻，搶奪日本所需要的生絲。之後荷蘭還在1622年進攻澳門，妄圖侵佔澳門並取代葡萄牙在澳門的位置，使自己的地位能夠合法化。然而，他們的進攻還是被葡萄牙人所擊退，並且在澳葡人的自衛行為也得到了明朝廷的支持，「今夏，經〔紅〕毛番仇殺澳夷，澳夷呼救甚急，助以酒米，張設軍容，紅番始遁創達」。[53]而且，這種直接武力來犯反倒是讓中國上下群情激昂，「直把我們（荷蘭人）看成謀殺者、強暴者、海盜……用這種方法是永遠達不到通商的目的」[54]，「他們的威脅並不比他們的許諾更有效果。他們這才明白他們噓聲恫嚇是不能希望得到什麼的，於是他們放棄了武裝遠征並征服中國的想法」。[55]此後，荷蘭人在敗退之後蜷縮在澎湖列島，進而佔據臺灣島作為據點，只能從事中日之間的走私貿易和轉口貿易。英國在開拓中國市場上更是無所作為。首先，他們的努力遭遇到多方阻礙，「一方面，葡人強烈反對任何歐洲國家染指中國貿易，特別是染指澳門周圍的商圈；另一方面，荷蘭人經常冒充英國人進行海盜活動，英國人在亞洲海域落下壞名聲，同時中國明朝也一直在禁海」。[56]再者外交管道的溝通最終所託非人，反倒是令英國商館蒙受了巨大經濟損失，而武力進犯澳門也只是館長考克斯的紙上談兵。

1619年組建的「英荷東印度公司防衛同盟」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通過阻截來自於澳門和馬尼拉的西葡船隻，[57]從而封鎖他們分布

---

53 明．方孔炤，《全邊略記》（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第14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卷8，〈兩廣略〉，頁553。

54 江樹生主譯、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I（1622-162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頁134-135。

55 利瑪竇（Matteo Ricci）、金尼閣（Nicolaus Trigautius）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上冊，頁196。

56 張蘭星，〈17世紀初的英日貿易及其失敗原因〉，頁175。

57 艦隊還對於往返於日本和菲律賓的中國船隻主動出擊，加以劫持，武藤長蔵指出，如果「中國商船前往菲律賓，或者由菲律賓前來日本，在途中一旦發現就予以捕獲，從而使得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能夠轉移至英荷兩國的基地……平戶一時之間成為英荷聯合艦隊的根據地，另一個則是巴達維亞。」參見武藤長蔵，《日英交通史の研究》，頁47-48。

在東南亞一帶的殖民港口與日本的聯繫，阻斷商品流入到日本。兩國組建聯合防衛艦隊阻擊西葡的船隻，並將獵獲的戰利品運回艦隊基地平戶瓜分。但是，由於英國人在英荷同盟當中始終處於弱勢，並不能有效配合荷蘭的軍事攻伐，「在防衛艦隊的編成當中，英國經常無法給予能滿足荷蘭方面的協助」[58]，因此，之後荷蘭人拋棄了英國人，單獨行動出兵澳門。雙方之間實力的不均和內在的矛盾使得英荷防衛同盟很快就形同虛設。曇花一現的聯合艦隊並沒有形成對於西葡持久性的嚴重威脅，反倒是整合和同盟的失敗使得英荷雙方心生嫌隙，分道揚鑣。因此，針對西葡的「英荷防衛同盟」既無法動搖葡萄牙的大船貿易，也不能在中國立足，還由於結盟方利益分配不均等各種原因而早早夭折。英荷，尤其是英國人，在無法獲得穩定和充足的中國商品的情形下，他們對日貿易的根基就更加不穩。

然而，英荷受制於西葡之處並非僅僅是貿易，在社會輿論上，英荷也遭到西葡的口誅和筆伐。首先，西葡指稱英荷兩國是海盜之國，在海上無惡不作、肆無忌憚地攻擊往來的船隻，甚至諷刺地說道，「荷蘭人走在所有外國人前面，他們不辭辛勞地從各地運來生絲、綢緞、天鵝絨和其他中國商品。他們對商船特別『感興趣』，這為荷屬亞洲貿易提供了大量的貨源。日本倭寇也應該學習荷蘭人的敬業精神」。[59]因而，幕府不應當讓這樣無法無天之人來日破壞日本對外貿易的正常秩序。其次，英荷人員在平戶「不守規矩、難以駕馭」，「醉酒鬥毆和放蕩不羈的行為普遍。在陸地上以下犯上、在航行中譁變暴動盛行。搶劫、姦淫和謀殺持續不斷」。[60]而且，英荷人無視規矩、肆無忌憚的作風也導致了與當地人之間的摩擦，引發平戶當地社會的動盪與不安，這進一步成為西葡指控的罪證。再者，西葡指摘英國的君主制並未

---

58 武藤長蔵，《日英交通史の研究》，頁48。

59 張蘭星，〈論17世紀前期日荷貿易及其成功原因〉，《史學集刊》，2014：5（長春，2014.9），頁88。

60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p. 163.

賦予國王絕對的權力，王權被各方勢力所約束和制衡而難以施展，而且英國人還時時挑戰統治者，「總是站出來與君王對抗，並且以他們手中的權力建造最堅固的城牆」。[61]來到日本之後，英人必然舊習難改，本性難移，將此不君不臣的習氣帶至日本，使日本的傳統和文化遭受衝擊。進而稱荷蘭反叛宗主國西班牙並且得到了英國的大力支持，這種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之人一旦進入日本，則很可能造成日本國內綱常秩序的混亂，「這可能在日本的臣屬（大名）心中孕育出荷蘭人對於西班牙所做的那樣（叛亂）的變動之心，在荷蘭人的挑唆之下，促使他人像他們那般去推翻現有日本的統治」。[62]不僅如此，西葡還控訴英荷東印度公司絕不僅僅是一個商業貿易組織，而是得到了自身國家統治者的授權，享有了建立外交關係、佔領土地、發動戰爭的政治軍事權力，是一個「準國家」、「國中之國」的存在。「（東印度）公司從政府處獲得的不只是獨佔東印度貿易的而且還被賦予了軍事、外交、司法、行政等涉及廣泛的權力，（從而）開始了殖民和貿易的（雙重）活動」[63]，成為了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軍事力量，自然不能小覷。西葡以此不斷提醒幕府統治者，英荷來日的目的不會僅僅是停留在商業利潤的層面，很可能存有政治圖謀，日本當政者理應謹慎以對。

儘管作為後來者的英荷在諸多方面都對西葡的勢力發起了挑戰，然而西葡的強勢反擊使得英荷的在日事業因此步履蹣跚，進展緩慢。在日英國人的位置更是尷尬，處在一種「進攻無力，退不能守」的進退兩難狀態，而且還腹背受敵。當時還是荷蘭小夥伴的英國只能站在荷蘭的背後與西葡對抗，同時不斷遭到荷蘭的算計和攻擊，荷蘭的諸多優勢都無法被英國撼動。正如在舊教陣

---

61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46.

62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46.

63 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頁167-168。

營當中，西班牙首先敗退，而在新教聯盟中，不敵荷蘭的英國也黯然離場，成為十七世紀初在日本四國爭雄當中最晚參戰卻也最早退場的國家。

（二）英國商館與荷蘭商館的競爭

在政治外交、商業貿易，以及軍事等方面，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商館與同處平戶一地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日商館的關係一直相當緊繃，進而基本上前者總被全面壓制。儘管考克斯一直向幕府和松浦氏宣稱英國的優越地位，稱荷蘭統治者只是英國國王的一個封臣而已，「他們的小國與英國國王強有力的政府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在某種程度上，英王是統治著他們的，在他們最重要的地方有英國人戍衛」[64]，兩國的地位應該決定雙方商館在日本的位次。然而，這些源自於優越感或尊嚴的說法，卻很快地被現實所挫敗，屢屢遭受荷蘭人欺侮的英國人不得不求助於領主，甚至上告到幕府處。例如1618年當荷船拖曳著一艘被其捕獲的英船「安騰頓斯」（Attendance）號駛入平戶港時，荷船多次鳴炮慶祝，極為高調張揚，英國商館因此深感屈辱，「故意向日本暴露英國人的弱點是荷蘭人的策略，這讓考克斯甚是憤怒」。[65]英國人這種無力處理與荷蘭人的爭訴而不得不求助於日本當權者，希望幕府伸張正義、出面調停或約束制止的情況，明顯暴露了英國商館的弱勢，也在日本人心目中塑造出一副被欺侮的受害者形象。然而，這副形象除了喚起日本社會對於荷蘭人霸道行徑的憤慨和對於英國人的憐憫，也增加對於英國商館背後的東印度公司和英國國家實力的懷疑與不信任。

另一方面，荷蘭人在海上的軍事力量得到了幕府的青睞。姑且不說1639年幕府下定決心驅逐葡船的重要根據之一，就是荷蘭的海軍實力可以保證其船隻未來不會受到西葡的攻伐而能定期來航。在先前越發收縮的海外政策之下，幕府將日本朱印船的安全

---

64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271.

65 村上直次郎，《貿易史上の平戶》，頁50。

交給荷蘭人來守護，「日荷雙方合作之基礎是日方『持有皇帝朱印狀』，從而荷方亦可向領受朱印狀的船隻發放通行證，保障其海上航行安全」，這種作法也反映了幕府的信任。[66]換言之，荷蘭人的在日形象主要建築在真正實力基礎之上，而英國在財力和軍力都不敵對手之時，只能以主導輿論、博得同情的來建構形象。從長遠來看，很明顯前者才能真正贏得幕府的傾心以及尊重。更何況荷蘭人在政治活動和輿論造勢上也不是沒有作為，不僅先下手為強地抹黑英國，還抓住英國宗教局面混亂不清的軟肋作為攻伐的靶子。之後，在協助幕府鎮壓「島原之亂」時，荷蘭人急切地以實際行動展現了其「作為忠實的封臣來為（幕府）效勞」的姿態。[67]在被圈禁於出島之後，他們也不惜自降身價，在幕府面前俯首稱臣向將軍獻上「作為家臣的敬意」，「作為日本的家臣來奉公」，「以語言和行動來展示出他們就相當於德川幕府的家臣；儘管有怨言，但隨時準備效勞並遵從幕府的旨意，無論這些聖旨多麼地令人厭倦」，以此來博得幕府的垂青。[68]正如學者羅伯特・馬克利（Robert Markley）所言，在十七世紀，相比耶穌會士的殉教而死或者英國人亞當斯那樣去儘量適應，荷蘭人在日本的存在方式卻是一味地「時刻準備著服從」（submissive readiness）。[69]

對於幕府而言，此時並非是虛無飄渺的國家實力，而是切實能為日本帶來貿易的考量決定了一切，而在這方面，具備強大軍事實力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對日貿易的表現上比英國更勝一籌。荷蘭人常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核心據點——萬丹，以雙倍高價買斷胡椒，並嚴防摩鹿加群島和班達群島的當地人銷售丁香和

---

66 王煜焜，〈博弈與犧牲：近世初期德川幕府海洋政策特點〉，《海交史研究》，2008：1（泉州，2018.6），頁90；永積洋子譯，《平戶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三輯）——自一六三三年九月至一六三七年十月》（東京：岩波書店，1969），頁28。

67 永積洋子譯，《平戶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四輯）——自一六三七年十一月至一六四一年六月》（東京：岩波書店，1980），序說，頁4。

68 Michael Laver,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Early Modern Japan: Gift Giving and Diplomac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0), p. 30.

69 Robert Markley.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 p. 255.

肉豆蔻等香料給英國人，盡可能地切斷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當地的進貨管道，從而無法向包括日本商館在內的其他沿途商站以及歐洲本土輸送足夠的物美價廉的商品。[70]首航日本的英船「克羅夫」號就是由於駐守當地的荷蘭人的口頭恐嚇與武力威脅，而只能從一些冒著生命危險來與英人交易的當地人手中，獲取了數量不多的丁香而早早北去駛往日本。[71]而另一方面在日本的荷蘭人還企圖進一步以低價甚至傾銷的價格戰將那裡的英國人逼入絕境和死路當中，望其知難而退。當1613年英國商館剛在平戶落戶時，荷蘭人就迫不及待地先下手為強，變相地傾銷手中的商品，荷蘭商館館長布勞威爾（Hendrik Brouwer, 1581-1643）下令在江戶和大阪經營的商務代表低價銷售呢絨產品，盡可能讓市場達到飽和而不給英國人可乘之機。英國人在日十年的經營當中，對於荷蘭人的價格競爭也是屢見不鮮，而對於此，英國商館無可奈何。荷蘭人在海域上猖狂肆虐，在攻擊西葡船隻的同時，也沒有對英國手下留情，這種「無差別」的海盜作風讓他們可以幾乎毫無成本地截獲各種物資和商品，將其拖曳回平戶，「（這些物品）不需要花費他們（荷蘭人）多少，而只是發射一枚炮彈就足夠了」。[72]荷蘭人大方慷慨地支配著他們手中充足的資本，在使他們自己獲利的同時卻使得英國人陷入被動和劣勢當中，而有限的資源阻止了英國人在花銷上與荷蘭人相抗衡。[73]而且，借助於這種通過軍事強力而在亞洲所塑造的廣泛貿易網路，荷蘭人可以從各地收羅和獵取各種特產和珍品，將其敬獻給幕府將軍與平戶的達官貴族們，用以

---

70 John Bruce, *Annals of the Honorable East-India Company from Their Establishment by the Charter of Queen Elizabeth, 1600, to the Union of the London and English East-India Companies, 1707-8*, vol. I (London: Black, Parry and Kingsbury, 1810), pp. 201-211.

71 ジョン・セーリス著，村川堅固譯，岩生成一校訂，《セーリス日本渡航記》，一六一三年三月十八日，頁49。

72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104.

73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p.168.

建立和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來自於波斯的馬匹、出自於東南亞和孟加拉的珍貴布匹、來自於爪哇和婆羅洲腹地的珍奇鳥類，出自於巴達維亞和荷蘭本土的製成品等等，都跨過亞洲運送至各個商館作為饋贈的佳品」。[74]英國商館難以望其項背，畢竟口頭的說辭並不比這些奇珍異寶來得更打動人心。以致於學者萊佛（Michael Laver）認為，贈禮作為一種系統化和體制化的操作是荷蘭在日成功並且維繫了兩百年之久的最重要單體因素，這使其能更好地融入到日本社會。[75]以上種種使得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本處於一種左右為難的尷尬地位，在正常的商業貿易上遠不如葡萄牙所經營的澳門—長崎之間大船貿易的規模，非法暴力的劫掠上又遠遜於荷蘭，無論從正常的還是非法的方式上，英國人都無法在對日貿易上取得優勢。倘若幕府對於葡萄牙人在日的傳教事業暫且姑息擱置，對於荷蘭人在公海上的肆意妄為置若罔聞，那都是其基於日本對貿易的渴望壓制了其他的顧慮。反觀英國人，雖然「只經商，不傳教」，雖然行為舉止有所收斂，但是商業貿易上卻表現平平，自然是令幕府失望不滿。

1617年到1620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設置在平戶、北大年和阿瑜陀耶的商館與萬丹之間的斷航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荷蘭人的攻擊和封堵，「由於荷蘭人間接的操作以及未曾料及的活動，自從上次有船隻從英國或者萬丹來航平戶，這已經是第三年了」。[76]學者巴塞特（D. K. Bassett）認為斷航對於平戶商館的影響是致命的，「如果（日本商館）能得到充分供應的話，商館是有可能被拯救

---

[74] Michael Laver,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Early Modern Japan: Gift Giving and Diplomacy*, p. vii.

[75] Michael Laver,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Early Modern Japan: Gift Giving and Diplomacy*, p. 17.

[76]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p. 12. 在東亞以及東南亞所置的商館，包含平戶、北大年和阿瑜陀耶，是直接隸屬於爪哇島上的萬丹商館，受後者統一指揮和管理。此時與萬丹商館處於同一級別的是設置在印度半島西海岸的蘇拉特商館（Surat Presidency and Council）。而後隨著英荷防衛同盟的形成，英國東印度公司也一度將據點從萬丹轉移至巴達維亞。

的」。[77]這三年的斷航與英荷加劇的商業和武力鬥爭緊密相關，英荷之間的鬥爭在各地都日益升級，衝突加劇。在日本，受制於平戶當地松浦氏以及幕府將軍的威權和強有力的統治，而且處在亞洲東北角的英荷商館實力也相對弱小，雙方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種較為溫和的、隱祕的、間接的方式進行，很少會發展成直接的武力對抗。但是，在日本外部的戰火也將隨著英荷船隻的到來逐漸燃燒到日本的領土，造成英荷商館之間少有的武裝對峙。1617 年，荷蘭艦隊在艦長亞當．韋斯塔伍德（Adam Westarwood）的領導下，「這些在平戶港的荷蘭人在他們的船上吹起號角，揮舞著火把和刀劍公開向英國宣戰，無論是海上還是陸上，盡他們所能奪取我們的船隻和貨物並且殺戮我們的人」。[78]到了 1619年，在日英荷商館的矛盾白熱化，若不是松浦氏的介入和幕府的態度，斷航許久而沒有英船支援的英國商館很可能會遭到荷蘭人的血洗，考克斯等人一度陷入極度的危險，命懸一線。[79]緊張的氣氛一直延續到1620年8月英荷組建防衛同盟的決定傳到平戶商館之後，雙方關係才因而發生了不自然的突然轉向。

1619年，英荷東印度公司成立了防衛同盟。此一防衛同盟本可以令英荷的日本商館摒棄前嫌，進而使氣息奄奄的英國商館從聯合行動當中受益。然而，英國人只能在這樣的同盟當中扮演一個小夥伴的角色，往往只能從共同截獲的戰利品當中分配到極少

77　D. K. Bassett, “The Trade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Far East, 1623-84: Part I: 1623-65,”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1/2 (April, 1960), p. 35.

78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302.

79　在寄往東印度公司的信函中，考克斯痛陳英國商館所遭受的襲擊，「一天有三次之多」，「他們（荷蘭人）一百人對一個英國人」，講述當時英國商館所處的嚴峻形勢。不僅如此，考克斯以及其他英國商人的性命還被荷蘭艦隊的司令官亞當．韋斯塔伍德公開懸賞以此進一步煽動荷蘭的情緒，慫恿他們持續的進攻。寡不敵眾的英國人只能閉門不出藏身在商館當中而不與荷蘭人有正面的衝突，還不得不招募一隊日本侍衛來守衛商館的安全，以防備荷蘭人隨時可能進行的襲擊。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p. 305, 317.

的利益。館長考克斯甚至抱怨英國人並未因此獲利，「荷蘭人輸入到這個地方（日本）的戰利品，我們（英國人）並沒有份，因而他們可以做很多我們不能做的事情」。[80]荷蘭人則時常控訴英國人配合不力，並理直氣壯地將掠奪物當中的大部分占為己有，留給英國人的更是所剩無幾了，「荷蘭人幾乎佔有了整個戰利品，（而英國人）所獲得的部分卻只能勉強地支付裝備的費用」。[81]根據學者村上直次郎推算，聯合艦隊在 1621 年和 1622 年的兩次出征為英荷商館所帶來的收益不超過十萬磅，然而扣除艦隊的經費和船員的薪酬等必要開支之外，「比起商館館員的奔忙勞碌而言，其收益是比想像中少得多的」。[82]無論是分配的歧視還是收支的失衡，在日英館都很難成為英荷聯盟的實質受益者。在日商館也並未能起死回生。當 1622 年英荷聯合艦隊在平戶解體的時候，平戶作為聯合艦隊基地的作用也就失去了意義，此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然對於平戶商館失去了耐心，一方面大幅縮編商館，一方面也命令考克斯等人立刻隨艦隊返航。

（三）英國商館與在日唐人的博弈

在十七世紀初，中國是所有遠東探險活動者的「麥加」[83]，「中國對日貿易的收益非常大，這是誘惑葡萄牙人產生渡航前往日本的最大原因」，[84]日本商館在當初也被看作是英國以及東印度公司通往中國大陸的跳板。在日設立商館只是「與中國建立直接關係的漫長努力當中的第一步，只是這個目標直到十八世紀早期才得以實現」。[85]正如學者馬士（H. B. Morse）認為，「為了獲取

---

80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211.

81 武藤長蔵，《日英交通史の研究》，頁694。

82 村上直次郎，《貿易史上の平戶》，頁57。

83 M. Paske-Smith, *Western Barbarians in Japan and Formosa in Tokugawa Days, 1603-1868*, p.18.

84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改訂增補）》，頁662。

85 Anthony Farrington, “The Japan Bas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Attempts at Inter-Asiatic Trade from Japan, 1613-1623,” in *William Adams and Early English Enterprise in Japan* (Discussion paper for a symposium held by The Suntory and Toyota

中國商品而進行的最為持久的努力是來自於平戶」。[86]這種努力不僅體現在單純獲得來自於中國的商品上，也在於一直嘗試與中國建立某種正式與合法的通商聯繫之上，這兩種努力互為表裏，並且從建館之初持續到被勒令撤館的整整十年。這個艱巨的使命落在了商館長考克斯的肩上，而他所物色來完成此項重任的人選則是「支那甲必丹」（China Captain）李旦。

十七世紀初，身處日本的唐人數量相當可觀。[87]「明中葉至明末清初，以閩南人為主的閩商一直是中日之間的主要貿易商，他們在日本九州的僑居亦成必然之勢」。[88]九州島西北角的長崎和平戶兩地成為貿易最繁盛之地，1618年時，僅長崎一地就有唐人「二三千人」。此兩地的中國人當中也是以福建人為主，「日本平戶灣西北海岸的福建商人僑居社區在十七世紀初時最為繁榮興盛，尤其是在李旦（當時的西方文獻記載一般稱呼李旦為 Andrea Dittis）任僑領時期，閩商在當地的活動達到了鼎盛」。[89]平戶和長崎所在的唐人社群是十七世紀初日本最為活躍的唐人群體，成為此時在日唐人的代表。作為福建泉州籍閩商的傑出代表的「支那甲必丹」李旦和歐華宇也是這一群體的領袖[90]——一直活躍在中

International Centres for Econom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No. IS/00/394, July, 2000), p. 30.

86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 p. 10.

87 學者李金明根據明朝當時的資料推算出在日華人華僑群體可能在兩萬五千人之多，「據萬曆四十六年（1618）親身到過日本的劉鳳岐說，萬曆三十六年（1608）僑居在長崎的還不到20人，『而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日本）諸島計之，約二、三萬人』。又據天啟五年（1625）福建巡撫南居益說，『聞閩越三吳之人，住于倭島者，不知幾千百家，與倭婚媾長子孫，名曰唐市。』這些與日本人通婚生子的華人假設有5,000家，每家以五口人計算，總數也達25,000人」，兩組歷史數據相互呼應。李金明，《明代海外貿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13。

88 任娜、陳衍德，〈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形成新論〉，《史學月刊》，2017：5（開封，2017.5），頁122。

89 錢江著，亞平、路熙佳譯，〈古代亞洲的海洋貿易與閩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2（泉州，2011.12），頁13。

90 學者岩生成一曾指出，在沒有什麼附加說明的情況之下，若稱呼支那甲必丹

日的海域之上並在臺灣有重要的活動基地，以此來經略經由臺灣所進行的轉口貿易，一度成為「在臺灣最大的走私貿易者」——正是因為李旦的身分使其被考克斯看重，而成為英國商館的合作夥伴。[91]

然而，當時中國的海禁政策註定了這條路困難重重，尤其是李旦本人的身分既無能力也無動力來搭建英國與大明朝廷的關係，所以李旦為考克斯所設計的通往中國的道路在根本上是難以實現的空中樓閣。一方面，從動機的角度審視之，李旦一直經營著長崎和臺灣之間的貿易，「中國船長、甲必丹自身的財運都是建築在其對於臺灣貿易的投資之上，因而必然會力圖保持中國大陸對於所有外來者都緊閉大門」，[92]英國商館的企圖與李旦所經營的事業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利益衝突。「當李旦活著的時候，平戶和臺灣之間利潤豐厚的海上航道使得中國人的貿易繁榮興旺」。[93]由於幕府賜予李旦渡航臺灣的朱印狀，李旦因此幾乎壟斷了臺灣與日本之間的貿易，例如1614年至1625年的十一年之間，從李旦和歐華宇兩人所獲得的海外貿易朱印狀以及他們所派出船隻的數目來看，臺灣是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地。[94]李旦變相地成為了

（captain）或者甲必丹支那的話，就是指他一人。岩生成一，〈明末日本僑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東洋學報》，23：3（東京，1936.5），頁70。近年學界研究指出，岩生成一文中的「華宇」應為「歐華宇」。參見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3（臺北，1999.9），頁450；陳國棟，〈馬尼拉大屠殺與李旦出走日本的一個推測（1603-1607）〉，《臺灣文獻》，60：3（南投，2009.9），頁57，61。

91 岩生成一，〈明末日本僑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頁77。

92 Adam Clulow, “Commemorating Failure: The Four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England’s Trading Outpost in Japan,” *Monumenta Nipponica*, 68: 2 (2013), p. 223.

93 Seiichi Iwao, “Li Tan 李旦, Chief of the Chinese Residents at Hirado, Japan in the Last Days of the Ming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17 (1958), p. 82.

94 根據學者岩生成一的統計，在李旦過世之前十一年中，李旦和歐華宇派出了至少二十三隻船前往臺灣以及交趾、呂宋和東京等東南亞主要港口。歐華宇在1614年和1615年派船至交趾、1616年和1618年渡航東京、1617年前往臺灣，李旦則是1617年、1618年、1621年、1622年、1623年、1624和1625年派船到臺灣，1618年和1621年渡航東京，1621年、1623年和1625年前往呂宋，每年前往這些地方的船隻數量不一，歐華宇派出了八艘船隻而李旦則遣船十八艘前往海外。從頻率上而言，

明朝海禁政策的遵守者、執行者和守衛者，只要中國大陸緊閉大門，那麼經由臺灣向日本輸出商品必然可以使其財運廣進且源源不斷。另一方面，從可行性的角度觀之，李旦本人的身分——私商和海盜——也註定了他是不可能通過正常的管道來幫助英國商館建立與中國的正式公開關係。在大明朝廷看來，李旦集團只是在中國東南海域為非作歹，違抗朝廷聖職的亂臣賊子，他們「禍亂沿海、從事走私貿易的海盜，是明廷『海禁』政策中主要打擊的對象。在此背景下，作為海盜身分的李旦、華宇不可能與中國方面、尤其朝廷要員取得聯繫」。[95]畢竟李旦與之後承接其衣缽的鄭芝龍（1604-1661）及其子鄭成功（1624-1662）不同，[96]李旦在當時並未發展成對於明朝產生致命威脅的海上集團，也就不會成為朝廷願意妥協和招安的對象，因而整體而言李旦集團並非是足以

臺灣明顯是李旦走私貿易的重要站點，從那裡獲得從中國大陸運來的重要物資，由他再轉送入日本銷售謀取利潤，這也是其享有特殊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當時英國和荷蘭的記錄當中，不時稱李旦為「臺灣最大的貿易者」或者「臺灣貿易的先驅者」。岩生成一，〈明末日本僑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頁79。

95 劉欽，〈日英早期通商研究（1613-1623）〉，頁121。

96 關於鄭芝龍與李旦的關係，江日昇在《臺灣外紀》中寫道，最初「程（黃程—鄭芝龍的母舅）有白糖奇楠麝香，欲附李旭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清・江日昇，《臺灣外紀》（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三編》，第9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卷1，〈江夏侯驚夢保山 顏思齊敗謀日本〉，頁802。黃宗羲的《賜姓始末》當中記載到「芝龍以父事之，（李）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沒之」。清・黃宗羲，《賜姓始末》（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三編》，第8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頁179。劉獻廷的《廣陽雜記》中又云：「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之於神，飛虹十卜皆吉，遂立以為主」。清・劉獻廷撰，汪北平、夏至和標點，《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頁169。；溫睿臨在《南疆逸史・鄭芝龍傳》中寫道，鄭芝龍「少隨大賈李習販日本……撫為義子」。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54，〈鄭芝龍傳〉，頁422。引文當中所提及的李習、李旭都是指稱李旦。鄭芝龍從澳門前往平戶並仕從李旦，其子鄭成功1624年也是出生在平戶，由於他的才幹得到了李旦的信任和重用，鄭芝龍「以父事之」並在李旦死後取代了李旦的兒子李國助（Augustine）成為了繼任者。參見岩生成一，〈明末日本僑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頁109；徐健竹，〈鄭芝龍、顏思齊、李旦的關係及其開發臺灣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3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288。

改變甚至撼動當時局勢的海上力量。

因此，這種合作只是考克斯的一廂情願，也使之陷入李旦所設計的騙局當中。李旦利用考克斯迫切的願望、老實的性格、貧乏的認知而一直在誤導著他，希望考克斯不要放棄他們，在這十年當中總是讓考克斯滿懷信心，每次都心甘情願地支付財物來配合他們的行動。

> 英國人將所有的希望都傾注在李旦可能為他們獲取來自於大明朝廷的官方通商許可的這一不太可能實現的許諾之上。隨後發生的則是長達十載的信任把戲，中國海盜頭目成功地說服考克斯，獲得通商許可就近在咫尺，只需要再多一點兒的資金和來自於館長對於打開數不清財富的多一些信心和承諾。[97]

自始至終，這些計畫都並不是藉由在日英國人自身來部署和實施的，而是依靠著李旦等在日中國人來計畫和布局的，因此，英國人對於來自於中國的資訊管道和打開中國門戶的所有努力，幾乎都是依賴著李旦所提供的第二手資訊，也無從證其真偽。正如在漫長的等待之後，李旦曾向考克斯傳達了明廷終於對英國通商的申請表示認可，稍後他又改變說法，指出由於新老皇帝（明神宗〔1563-1620，1572-1620在位〕、明光宗〔1582-1620，1620在位〕和明熹宗〔1605-1627，1620-1627在位〕）更替、政權更迭，以及後來北方戰事吃緊，因此明朝無暇顧及英方的通商請願。[98]李旦此時巧用中國當時改朝換代的時機來為自己的無所作為再一次脫罪，這一如往昔般地給了考克斯希望，可是過程中必然出現某種挫折，然後再許諾考克斯困難一定能被克服，因而希望英國商館稍安勿躁、靜待佳音，通商之事指日可待。直到英國商館全員撤離日本的時候，對於這項中國計畫都是屬於一種一知半解的狀態。

---

97 Adam Clulow, “Commemorating Failure: The Four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England’s Trading Outpost in Japan,” p. 222.

98 Adam Clulow, “Commemorating Failure: The Four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England’s Trading Outpost in Japan,” p. 222.

「（李旦）以花言巧語來籠絡考克斯，佯裝認識諸多達官貴人，並稱會為英國人在中國的重要地方建立商館而斡旋，他以這種方式多次欺騙老實的考克斯，使得後者許諾會供給他巨額的資金用以融通」。[99]最後，英國商館為此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在1623年英國商館被拖欠的總帳目當中，李旦的欠款幾乎是整個未收回款項的一半。「（未收回的帳目總額）達到了一萬兩千八百兩，而這其中有高達六千六百三十六兩是曾經租借房屋（給英國商館）的中國人李旦所欠下的」，[100]「考克斯花費了六千六百三十六兩白銀卻無異於花錢填補無底洞，永無止境」。[101]而這筆欠債隨著英國商館的撤離，以及兩年後1625年李旦的過世，也就無疾而終了。英國人嘗試以「金錢外交」的方式來打開中國門戶，然而「被他們當做仲介人的平戶和長崎商人卻最終只是將這些賄賂揣進了自己的荷包」，[102]在這漫長的過程中，他們從英國商館尤其是考克斯本人所籌畫的中國攻略中謀取了巨額的私利。

總體而言，被英國東印度公司委以開拓中國重任的英國在日商館意欲通過李旦採取和平的外交管道被證明是行不通的。畢竟英國人與在日唐人都欲經營中日貿易，因而根本上他們之間是一種對立和競爭的關係，友好與合作只是表面和暫時的。然而，英國商館尤其是館長考克斯卻身在其中被誤導、被蒙蔽甚至被欺騙，將開拓中國的計畫建立在一次又一次虛無縹緲的承諾之上，中國的市場在咫尺之外，卻始終遙不可及。最終，「沒有能在中國獲得立足之地是英國商館從日本撤離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沒有了它（中國），他們（英國人）是不可能有效地與荷蘭人和葡萄牙人競爭的」。[103]

99　加藤三吾，《三浦の安針》，頁260。

100　宮永孝，《日本とイギリス——日英交流の 400 年》，頁31。

101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 p. 300.

102　C. R. Boxer, ed.,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 4.

103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300.

三、英國商館與日本社會的關係

在日英國商館與其周圍的日本社會存在著緊密的關係。與英國商館聯繫互動的日本人士，不僅包括幕府和平戶領主等在內的社會上層，還有時時刻刻與英國人打交道的日本平民。而在這些關係上，英國商館再次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之境。

（一）德川幕府保守化的政策

日本幕府最初對英國船隻來航及在日建館經營貿易抱持著開放的態度，這可從德川家康回覆給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 King of Scotland, 1567-1625; King of England, 1603-1625）的國書以及賜給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特許狀中，清楚地感受到。「希望與陛下之間的友誼永續，也希望您的臣民來航我所統御之下的任何地區、任何港口。他們會受到最熱情和親切的歡迎和接待……我會依照他們所期望的那樣對於他們的事業給予幫助」。[104]德川家康賜予英國人買賣自由、交易公平以及免稅的特權，給予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的保障，還在英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方面做了相應的規定。[105]

隨著德川家康的過世以及德川秀忠開始專權，幕府的政策轉趨保守。1616年，德川幕府頒布了「元和禁教令」，並「將禁教與限制貿易聯繫起來」。[106]這種政策的轉變在發給英國人的新貿易特許狀中充分地展現。首先，幕府對於英國人的經商等活動加上了限制和說明性條款，進一步規範和監督英國人在日的舉動。1616年的新特許狀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地指出「無論他們（英國人）的船隻抵達的是哪一個港口，都應該盡可能快地退回到平戶（及其港口），（只能）在那裡銷售商品，保證日本的所有其他地方都不得在岸邊接受任何他們的商品，或者交易，而只能在平

---

[104] ジョン・セーリス著，村川堅固譯，岩生成一校訂，《セーリス日本渡航記》，一六一三年十月八日，頁180-181。

[105] Derek Massarella and Izumi K. Tytler, “The Japonian Charters: The English and Dutch Shuinjō,” *Monumenta Nipponica*, 45: 2 (Summer, 1990), pp. 197-198.

[106] 尤建設、吳佩軍，〈試論德川幕府時期日本與東南亞的朱印船貿易〉，《南洋問題研究》，2006：4（廈門，2006.12），頁92。

戶一地」。[107]雖然之後又加上了長崎，但是管理的原則依舊沒有改變。新掌權的將軍德川秀忠一改其父親的寬容態度，統治伊始就限制了在日歐人的經商自由，命令所有的外國人都必須退回平戶和長崎。「在老將軍的時候所賦予的特權是，在他的整個領土之上，我們英國商館可以在合適的地方進行交易，購買或者銷售；（然而）在這些賜予的新權利當中卻只有兩個地方被指明出來，他們是平戶和長崎」。[108]英荷以及西葡從此之後就被禁錮在九州島的兩個毗鄰的市鎮。

其次，新的特許狀對於英國商館的要求進一步升級和明確。之前規定「他們應當根據用途，分類船上物品，並列出清單上繳」，[109]1616年則明確提醒英國商館對於將軍所需的商品，「應為他保留」。[110]將軍德川秀忠要求英國商館在每次英船來航之時，製作一份商品名錄交由松浦氏呈送給幕府過目，幕府享有優先選擇和購買的資格。到了次年，「1617年四月，幕府通過平戶藩正式確立了（英國）商館採購船的臨檢制度」。[111]再者，刪減了一些原先明示的特權條款，不再明言英國輸入日本的商品可以免稅；未言英國商船可以任意寄港、滯留或者離去的自由；也並沒有重申英國人離去之時自由處置商館屋舍的權利。[112]

德川家康版特許狀的重心是在保障英國人在日的貿易自由，然而在秀忠所頒布的特許狀當中，重心卻出現了轉移，以商業活動為主旨的特許狀逐漸轉變成對於英國商人的整體規範，規範重心逐漸從經濟活動轉為社會行為規範。在德川家康的特許狀中的

---

[107]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289.

[108]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p. 83.

[109] 村上直次郎譯註，《增訂異國日記抄》（東京：雄松堂出版，2005），頁185。

[110]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289.

[111] 劉欽，〈日英早期通商研究（1613-1623）〉，頁148。

[112] 村上直次郎譯註，《增訂異國日記抄》，頁197-198；武藤長蔵，《日英交通史の研究》，頁766-767；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p. 289-290.

七條許可權中，有四條是直接或者間接與貿易自由相關，另外兩條是對於英國人財產權的保障和治外法權的認可，剩餘的一條則是要求英國商館提供商品目錄。而德川秀忠的特許狀中，只有第四條一項是強調貿易自由，不能強買強賣，第一條、第三條則與宗旨背離，買賣限制在平戶港以及需優先保障幕府所需物資的供給。在某種意義上，特許狀中商業「氣氛」減弱，行政的、社會的「語調」在增強，且總體趨勢是自由在萎縮，限制與隔離成為基調。儘管在兩版的特許狀都肯定了英國人可以擁有財產權和司法權，然而從德川秀忠專權之後的整體社會氛圍來審視，這兩項被延續和保留的特權已經被賦予了一種負面的色彩，體現著幕府進一步隔絕英國人等歐洲人的一種意圖，不再是為了保障英國人的人身財產等權利。貿易權和治外法權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影響、互相制約，貿易權的縮減可能是治外法權被在日英國人濫用所間接造成；而且貿易權的限制也意味著治外法權的萎縮。畢竟，仍舊承諾給英國人的「治外法權」是建立在已縮小的地理範圍之內，是以英國人被圈禁在平戶和長崎這兩個劃定的地理空間當中為前提的。總體而言，與當初德川家康所賦予的自由旨意截然相反，1616年德川秀忠所賜予的特權則透露著一種束縛之感。

除此之外，雙方之間的溝通也變得越發困難，幕府政策和對外態度的專斷使得英館無法表達和實現自己的訴求。新任將軍德川秀忠展現出諸般暴戾的性格，「沒有人敢於向皇帝（將軍）提及任何他們認為會令他不滿的事情，他的性格如此暴怒，這就意味著送死和毀滅」。[113]從英國人的角度而言，詹姆斯一世致德川家康的國書，向日本充分展示了英國商人是國王的直接代表和使臣，授予了東印度公司極大的權力與對方進行協商，「這些信件將國家之間的貿易視為彼此互惠，並且表明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代表是作為國王直接的代表和使臣」。[114]然而，在幕府看來，這

[113]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187.

[114] Miles Ogborn, “Writing Travels: Power, Knowledge and Ritual on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s Early Voyag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些來訪通航的英國人只是商人，「並非是官方的代表使節團，因而沒有任何資格向幕府提出任何要求」。[115]英國人甚至是以一種「準臣民」的身分被納入日本的社會當中，因此，給予他們的特權也並非是與一個和日本相當的主權者之間的契約協定。在日本統治者心中，真正的外交使團是不會僅僅以貿易這些邊緣事務為出使主要目的，傳統的外交應當是以斡旋戰爭與和平、領土爭端等為宗旨。從根本上而言，幕府賜予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並非是當時西方人所認為的具有強制性和約束力的法律，因而隨著環境的改變、統治者的更迭以及其意志的轉變，這些許諾會發生相應的變更，甚至可以從根本上否認和推翻。

並且，幕府對於基督教態度的轉變充分體現了其保守性格的發展，而保守主義的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國內基督教信眾的激增和勢力的擴大而觸發的。德川家康對於基督教的態度從之前的寬容姿態轉變成一種保守的態度，從而開啟了德川幕府時期鎮壓基督教的序幕。以日本傳統的佛教和神道教來對抗西洋舶來的基督教，幕府從1612 年頒布「天領」的禁教令，[116]到 1613 年末將其推廣至整個日本，再到1614年將高山右近（1552-1615）、內藤如安（1550-1626）等四百餘人流放驅逐至馬尼拉和澳門。其繼任者德川秀忠和家光（1604-1651）兩代將軍則更是變本加厲地在全國鎮壓天主教，不僅繼續驅逐傳教士，而且以威逼利誘甚至是花樣迭出的酷刑來逼迫日本信徒轉教、棄教，直到為了斬草除根而選擇封鎖整個國家。這種宗教政策的轉趨保守直接導致日本與西方四國的關係出現巨大的變化，造成和西葡之間關係的裂痕，以及與英荷之間關係的調整。學者斯克里奇（Timon Screech）指出，正是英國人來航日本之後的積極活動促成了日本禁教形勢的突然升級，這是英國商館以商業手段之外的方式向在日西葡勢力發起的

27: 2 (January, 2002), p. 161.

115 Derek Massarella and Izumi K. Tytler, “The Japonian Charters: The English and Dutch Shuinjō,” p. 200.

116 「天領」幕府將軍的直轄領地。

進攻，而且效果顯著。[117]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幕府在1613年底將禁教措施擴大至整個國境，1613年的全國禁教令「是幕府頒布的第一部旨在全面控制基督徒的官方聲明……並且作為德川幕府的基本法條之一被全面執行並受到推崇」。[118]斯克里奇的說法未免過於誇大了英國人在這種政策轉變當中的作用，但是英國人在來航之後的輿論造勢也必然推升了禁教的局勢，並進一步離間日本統治者與西葡之間的關係。然而，英國人的遊說與鼓動在打擊舊教國家在日勢力的同時，也威脅到自身的存在。「只經商、不傳教」的英國人始終無法說服幕府作為新教徒的他們與天主教的西葡有何本質區別。1616年幕府老中們反復地質問前來覲見的考克斯關於英國人的宗教立場，「幕府派人前來詢問我們英國人是不是基督徒，有二十次之多」，[119]考克斯堅稱「我們絕不是耶穌會士和托缽僧人的朋友，也絕不會允許他們的團體存在於英國本土，而是會將其處死……他們對於我們以及我們宗教的仇恨甚至超過了任何其他人」。[120]但是，在這一番解釋和承諾之後，幕府仍舊發布了限定在日歐人的新規，將西方四國困守在平戶和長崎，「黑船英舟同屬此宗門，若在你（薩摩藩主島津家久）領內靠岸，應使之回航長崎平戶，不得在領內進行買賣」。[121]英國人

---

117 「據說在教團與日本當局維繫了幾乎三個世代的相對和諧之後，英國人的到來使得幕府開始敵視教團，耶穌會士們自己也是這麼說的」，「在1612年夏天和1613-1614年冬天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可以導致幕府態度的轉變？唯一一個可以被認為是觸發這種轉變的誘因就是英國人的來航。」Timon Screech,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Japan Review*, 24 (2012), pp. 3, 9.

118 Timon Screech,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p. 9.

119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280.

120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175.

121 李德霞，〈淺析17世紀上半葉日本「鎖國政策」對其外貿的衝擊〉，收入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中國博物館協會航海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編，《人海相依：中國人的海洋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86。幕府對於英國人的宗教信仰始終是模糊不清的。不僅僅此刻在德川秀忠剛專權時，考克斯等人被老中們細緻盤問，而且哪怕是直到1673年英國船隻「回歸」號返航停靠在長崎港外等待幕府通

在借助幕府的保守政策打擊對手的同時，最終也淪為這種保守政策的受害者。

英國東印度公司設在日本一隅平戶港的商館在其經營的十年之中，切身地體會到幕府政策的不斷調整所引發的影響。幕府逐步朝著保守、限制和封閉的政策走向使得商館在日發展之路變得越發坎坷，看似突發的政策調整也逐漸被吸納進系統性的體制變革當中，形成一種難以扭轉和抗衡的趨勢。「日本政府對於歐洲人越發增強的敵意，尤其是在1616年之後，而且始終無法在那裡尋找到英國產品的理想市場……使倫敦的主管們很快地喪失了信心」。[122]不得不說，公司高層所表現出來的心灰意懶進而選擇閉館的決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於日本整體環境的預判之上。日本最高統治者身上越發展現出來的保守、反動和排他性格讓公司看不到在日本的光明前景。雖然與之後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在日的遭遇相比，這種保守氛圍在1613年至1623年的十年當中也只是在醞釀而已，然而對於「先天羸弱」的英國商館而言，卻最容易受到衝擊，也最可能淪為這種一視同仁政策之下的犧牲品。這種不斷緊縮的政策和越發壓抑的外部環境已然成為一種不可承受之重。

（二）平戶松浦氏的壓榨

因為對外貿易的傳統、開放的經濟以及與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接近的有利位置等等諸多的優越條件，英國東印度公司選擇在平戶建立商館，但是平戶的統治者松浦氏一族在日本的政治格局當中處於邊緣位置。作為外樣大名，[123]松浦氏自然是不會得到德

航答覆時，英人也不斷遭到長崎奉行等官員的反覆詢問和求證。在一定程度上，返航的英國人也是由於宗教問題而遭到幕府的拒斥，致使重啟貿易無望。

122 D. K. Bassett, “The Trade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Far East, 1623-84: Part I: 1623-65,” p. 34.

123 在江戶幕府成立之初，根據與幕府將軍之間關係的親疏情況，日本各地大名被分為親藩大名、譜代大名和外樣大名。外樣大名是在1600年「關原之戰」之後才臣服於德川家康的大名。在地理位置上，外樣大名的藩地往往是遠離江戶的統治中心。在政治上，不被統治者所信賴，且在原則上是不允許外樣大名在幕府當中擔任要職。

川幕府的充分信賴和全力重用，而且與九州島上實力最強盛的薩摩藩相比，平戶只是一個中等面積的領地，年收入是薩摩藩的十分之一弱而已，「（平戶）是被這樣一個勢力較小的家族統治著，他們甚至是在九州都影響極小，在德川幕府的政治首都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位」。[124]因此，英國商館選址於此，將未來的命運與平戶捆綁在一起託付給松浦氏，並不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松浦氏能給予英國的保護和支持，畢竟會受限於其本身的政治資本和綜合實力而無法周全。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松浦氏的熱情和友善，使得首航船長塞力斯婉拒了德川家康在江戶附近的浦賀建館的建議而執意落戶於此，然而這種熱情和友善卻並非是沒有代價的。來自於松浦氏以及平戶眾貴族持續不斷的經濟勒索，直接的或者間接的，一度成了英國商館無法承受之重。正如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文獻中的生動比喻那樣，「這個家族（松浦氏）把他們當做『奶』牛或者產錢的牛」。[125]首先，松浦氏等貴族會向英國商館低價購入商品再轉手高價賣出，甚至故意挑起英荷之間的價格競爭從而坐收漁翁之利。例如，松浦隆信（1592-1637）在派人向考克斯借款的時候，特意提醒荷蘭人已經向領主提供了資金，所以英國人也應當在領主經濟困難的時候出手相助；[126]在向英國商館賒賬的時候，不忘提及荷蘭商館已經同意提供一萬兩日本銀的貨資；[127]在購買英國銷售的胡椒、寬布、暹羅木材的時候，時時比較荷蘭商館給出的價格，意圖讓英國只能被迫接受低價而沒有還價的空間。[128]

---

[124] Adam Clulow, “Commemorating Failure: The Four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England’s Trading Outpost in Japan,” p. 218.

[125] Adam Clulow, “From Global Entrepôt to Early Modern Domain: Hirado, 1609-1641,” *Monumenta Nipponica*, 65: 1 (Spring, 2010), p. 8.

[126]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211.

[127]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92.

[128]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104.

其次，出現財政困難資金周轉不靈的時候也總會向英國商館貸款，而這些貸款經常是低息甚至無息的，這就與在江戶和大阪的大商人高息貸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向日本人借貸對於松浦氏而言總是充滿變數甚至危險的，一旦拖延還款，利息和債務會像滾雪球一般地迅速疊加，「在這一時期日本商人借款給大名一般是按照百分之十來收取利息」。[129]所以，相比於未能還貸而使財務惡化，選擇向平戶的英荷商館借貸是穩妥之舉，英荷自然也總是無可奈何地屈從。而在還款時，除了以直接拖欠及分期還款的方式來延長借款的時間之外，松浦氏還會增添一些附加條件和禮俗要求，致使英國商館疲於應付。譬如，松浦氏將還款和再次借貸捆綁起來，[130]或者通過以貸還債，甚至還有以貸借貸的方式掙取利息。[131]尤其是松浦隆信的這些貴戚們輪番在向英國商館請求借貸和要求購買貨物，然而他們卻「很少或者完全不能償還或支付」，[132]使得英國商館的財務時常入不敷出。日本學者宮永孝甚至認為商館「從日本敗退的首要原因就是賒賬銷售」。[133]再者，還會強迫英國商館優先考慮與平戶本地的商人進行交易。之後從事貿易的商人也是有所限定，松浦氏會對於違背和犯禁之人加以懲處，例如徵收懲罰性的稅收。[134]這種懲罰性的稅收政策表達了松浦氏對於與他爭利或為敵的平民商人的不滿，為此出臺的震懾性措施。甚至在極端情形之下，松浦氏還曾命令違逆之人切腹謝罪。[135]而且英國人還得入鄉隨俗，在各種場合饋贈禮品和設宴款待。英國人在日本享受的所謂特權，更多只是停留在黑字白紙之

---

[129] 外山幹夫，《松浦氏と平戸貿易》（東京：国書刊行会，1987），頁225。

[130]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92.

[131]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242.

[132]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314.

[133] 宮永孝，《日本とイギリス――日英交流の 400 年》，頁31。

[134]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242.

[135] 外山幹夫，《松浦氏と平戸貿易》，頁204。

上，難以實現，以至於考克斯抱怨道，與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相比，在平戶的英國人是處處受限，「我們沒有特權，有的只是空話而已」。[136]

在 1616 年限制令之後，英國人沒有多少退路可選，即便如此，考克斯還曾一度打算將商館從平戶遷移至長崎。在長崎奉行許諾英國人可以在當地任意選址建館之後，考克斯 1620 年致信給暹羅、北大年和萬丹，「倘若他們今後遣船來日的話……可以前往長崎港停靠」。[137]但是考克斯對於長崎的現在和未來的評述未免過於樂觀，畢竟葡萄牙仍舊牢牢地把持著長崎，表面上看似「去天主教化」的長崎仍舊存在著大量的天主教徒和隱藏著的耶穌會士們。而且掙脫了舊的矛盾並不表示新的矛盾不會出現，畢竟平戶是日本的一個有機部分，那裡出現的問題是典型的，也是具有當時日本特色的，平戶與長崎的相似性是遠遠大於它們之間的差異性。因此，商館即便走得出平戶，卻不一定逃得出困境。只是暫時的逃避問題，並非可以真正解決問題。當然，在近世初期的日本，問題的癥結是不可能完全解決的。在日本進退兩難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最終只能選擇徹底離開來擺脫無以化解的窘境。

（三）與日本民眾緊張的關係

學者馬薩雷拉（Derek Massarella）評價英國商人們在日本的十年經歷不過是蜻蜓點水，不僅沒有在日本社會引起太多波瀾，也並沒有對英國人自身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 整體而言，英國人所進入並居住了超過十年的日本世界並沒有讓商人代表們發生明顯的改變……（他們）只是對於日本有著表面上的認知，但是卻極少做出超越表面而深入探索日本文化和社會的努力，而這卻是減少他們的商業運

[136] Anthony Farrington,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vol. I, p. 563.

[137]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I, p. 314.

作阻力所必須的。[138]

雖然英國人會採用日式建築的風格、會穿著和風的服飾、會融入日式的飲食習慣、會慶祝當地的節日、會使用一些日語、會與當地的一些女性、雇員、鄰里之間有進一步的互動，但是這些融入的努力始終是不充分的。努力的動力不夠、努力的程度不足、努力的結果不佳，總是給人一種停留在「表面」的印象，呈現出一種疏離感。而英國商館與日本民眾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疏離的，還會進一步升級成一種充斥著摩擦、對立和衝突的關係。

首先，英國商人與日本女性常有交往，然而這些交往並不純然是浪漫、溫馨並充滿人情味的，反而總是呈現出一種不穩定，並且還充斥著算計和爭鬥。即便是融入日本社會最深，已經非常「日本化」的亞當斯，他的經歷也仍舊呈現出一幅不祥和的畫面。即便已在日本娶妻生子，但亞當斯仍舊時常想著返回英國與家人團圓；除了這位日本妻子之外，另外一位平戶女子與亞當斯的關係既反映了其與「亞當斯夫人」之間的某種疏離，也反映了其與日本女性之間交往的隨意性；[139]而最後在財產分割當中對於其日本夫人的忽略，也透露出亞當斯對她的冷淡以及他們雙方之間的緊張關係。[140]其他英國商人與日本女性之間關係也呈現出明

---

138 Derek Massarella, *A World Elsewhere: Europe's Encounter with Japa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41.

139 平戶女子與日本妻子是不同人。亞當斯的日本妻子在當時英國人所留下的史料當中，並沒有有關其姓名的資訊，而是被稱之為「亞當斯夫人」（Mrs. Adams）或者「船長亞當斯的妻子」（Captain Adams' wife）。她為亞當斯誕下了一兒一女，即約瑟夫（Joseph）和蘇珊娜（Susanah），1634年8月在日本過世，並且與亞當斯合葬於三浦逸見的山頭。而亞當斯在平戶還與另外一名女子同住，育有一女，此後她們還得到英國商館館長考克斯的幫扶，不過她們在幕府執行鎖國政策之後被驅除出日本。加藤三吾，《三浦の安針》，頁247；C. J. Purnell, ed., *The Log-book of William Adams, 1614-19: with the Journals of Edward Saris,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Japan, Cochin China, Etc.*, p. 185.

140 「在債務還清並且劃除葬禮的費用之後，我剩下的所有財物將會一分為二，其中一半——在日本以及東方其他地方的所有物——將會贈予身處英國的我親愛的妻子與孩子，而上述錢財的另一半則留給我在日本生活的親愛的孩子們，約瑟夫和蘇珊娜。」皆川三郎，〈William Adams研究——日英における評価と人間Adams——〉，頁86。

顯的不穩定和隨意性。一對多的關係、相互交換或者贈送的「分享」，從實質上透露出情感的淡漠。[141]最後，在英國男性離日之時都選擇隻身離開，而未將這些陪侍他們的日本女性與他們的混血孩兒一同帶離，這些現象明白地呈現出這種關係的無情和冰冷本質。[142]至於那些經濟狀況堪憂而且任性妄為的英國船員們，與他們產生交集的日本女性又只是青樓女子，以出賣身體而換取錢財，因而雙方之間的關係更是赤裸裸的金錢關係，更無實質性的內涵；再加上這些船員們的嗜酒好鬥，因酗酒和女人而產生彼此的矛盾、與荷蘭人的衝突，以及與日本店家的爭執等等，都為英國商館以及當地的社會帶來了大量而嚴重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與英國男性接觸和交往的日本女性遠不是引導英國男性瞭解日本社會的管道，反倒是引發一系列英日矛盾的導火線。正如一個來日之後醉酒行兇的英國船員在臨刑之前所說，「希望所有的船隻（上的人們）引以為戒，要小心酒和女人，（正是這些）讓他過早地死去」。[143]

其次，英國人與日本僕役之間的相處也是問題叢生。英國商員對於服侍的奴僕不時頤指氣使、對於身負多重使命的翻譯始終抱持懷疑態度、對於大量招募的日籍船員或者建築工人總是懷有滿腹牢騷，商館內部的英日關係充斥著各種不和諧的雜音。而且，作為雇主的英國商人往往憑恃手中權力而對於日本僕役濫用

---

[141] Alison Games, *The Web of Empire: English Cosmopolitans in an Age of Expansion, 1560-16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05-106.

[142] 隨著日本禁教措施的升級，排外情緒也在不斷發酵，之後德川幕府在1639年命令驅逐英國人和荷蘭人在日的兒女以及他們的母親，「今年（1639年）出航的（荷蘭）船隻上，為荷蘭人和英國人誕下過兒女的全部日本女性以及生父是英國人和荷蘭人的孩子一起，一個人沒有例外地送出至雅加達……而且，（此後）禁止與他們之間的一切信函交流」。永積洋子譯，《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四輯）——自一六三七年十一月至一六四一年六月》，一六三九年六月十六日，頁181。

[143] Ri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175; Thomas Rundall,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p. 158.

刑罰，使得雙方關係中溫馨默默的時刻顯得難能可貴。[144]緣於史料視角的限制，從英國人記述當中反映出來的，「並不是商人代表們的虐待和苛刻，而是由於日本傭人自由隨性的個性」。[145]無論真實的情況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最終的結果都指向了英國人與他們的僕役之間的關係始終是處於一種緊繃的狀況，雇傭關係的惡劣使商館的各項業務因此拖延、甚至破壞，進一步導致雙方之間只能形成相對短暫的雇傭關係，人員的流動率也高。雇傭關係的不可持續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英國人融入日本社會的失敗，不能充分利用本土社會的人力和物力來支援人手、物資、經費皆是有限的商館。

再次，早已來日的西葡傳教士們在日本的領土上播撒了上帝的福音，許多日本人因而成為天主教徒。英國商館在日期間，這些本土信徒在日本尤其是九州島上已是大量存在，他們無論在宗教信仰上還是現實生活中自然是對於西葡更加親近，而與西葡相敵對的英荷有著距離感甚至是懷抱著仇視的態度。日本信徒容易在傳教士的挑唆下破壞英國的在日事業，甚至會危及英國人的安全。散見在考克斯日記和信函各處表達出令他擔憂的境況。[146]另

---

144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p. 249, 265-266;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p. 57, 221, 235; James Lewis, "'Nifon Catange or Japon Fation':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p. 273; Anthony Farrington,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vol. I, pp. 124, 179, 401.

145 James Lewis, "'Nifon Catange or Japon Fation':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p. 167.

146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我們的敵人，如同長崎和京都的商人也是」；「所有那個地方（長崎）、京都和江戶的商人都是敵視我們的」；「在這些地方有很多的天主教徒，如果他們能夠的話，他們會對我們施加傷害」；「他們對於我們的仇恨是由於神父們，後者挑撥他們與我們作對，使我們被所有的日本人都厭棄」。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p. 139, 171;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p. 193, 325.

一方面，英國人自身對於這些本土天主教信徒，即便不是憎恨，也只是冷漠。正是出於這種心態，英國人在日不斷批評西葡的傳教活動及其背後的意圖，而這些言論也是日本禁教政策日趨嚴峻的重要原因之一。稍後，當日本開始驅趕傳教士與迫害日本信徒時，這些堅守信仰的日本信徒寧可赴死也不棄教的事蹟，在西葡尤其是傳教士筆下被不斷提及甚而被戲劇化、被史詩化的場景，在英國人的記述中卻甚少提及。「在商館眾多的信函以及考克斯的日誌當中幾乎沒有與此相關的材料，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暗示出，商人代表們自身對於當地基督信徒的行為很少有認同感，也沒有多少興趣」。[147]英國人對於發生在日本信眾身上的悲劇基本是冷眼相對的，甚至可能是慶幸的，這種冷淡直接透露出來的就是英國人與同為基督教信徒的日本人之間無法消弭的距離。

再者，英日雙方最為直接的衝突就是船員與日本人的紛爭。當船員登陸平戶之後，他們就時常酗酒鬧事、滋事擾民，甚至與日本人鬥毆。雖然這些船員可以帶給平戶的各種行業源源不絕的生意，也是當地人所嚮往的，但是這群素行不良的船員也會在平戶引發持續不斷的衝突。「常見的是，我們當中的一些人離開船艦，就在岸上偷偷的待上一個星期、兩周或者是一個月之久」，[148]「英國水手的荷包裡裝滿了倒賣海上搶奪的戰利品而換回來的錢財，因而他們在小鎮上（平戶）吃吃喝喝、聚眾鬥毆」。[149]這些船員「是如此的放蕩和墮落，以致於我必須將船隻變成一個勞教所來懲罰他們的罪行」。[150]一方面，日本人尚武好鬥的脾性也常會被英國水手們的囂張跋扈激發出來，他們也會主動挑釁英國人，進而產生各種難以收場的正面衝突，造成雙方人員的傷亡；

---

147 James Lewis, "'Nifon Catange or Japon Fation':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p. 313.

148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328.

149 Montague Paske-Smith, *A Glympse of the English House and English Life at Hirado, 1613-1623* (Kobe: J. L. Thompson and Co., Ltd., 1927), p. 45.

150 Anthony Farrington,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vol. II, p. 1549.

一方面一些心存惡念的日本人還會利用英國人的軟肋要脅英國人，使出不同的招數引君入甕，使英國人難辭其咎而處於不利的地位，這為商館帶來了極大的麻煩。[151]為了減少酒後鬧事，塞力斯也會頒佈節制飲酒的措施或者暫停酒類的供應，[152]平戶領主松浦隆信也命令日本人家中或店內在日落之後不得接待英國人，然而這些命令的制約效果是有限的。[153]當大量英國海員湧入到日本之時，平戶變成了一個是非之地，這裡成為兩個社會、兩種文化和兩個民族衝突前線，充滿了動盪與不安。身處平戶的英國商館自身因而也就陷入一種緊張不安的社會氛圍當中，難以自拔、無法逃脫。

不僅如此，商館從幕府手中所獲得的一系列特權，例如治外法權等，在給與英國人一把保護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他們受到日本社會的騷擾和侵犯的同時，也人為地在他們與普通日本社會之間劃出了一條無法逾越的界限，使得英日之間的隔閡無法消除，英館成為一座在日本社會環繞當中的飛地和孤島。這些衝突又是明顯地反映在商館本身的建築，商館、倉庫和碼頭的不斷擴建是以不斷拆除周邊日本民居為代價的——「他（松浦隆信）告訴我，他會幫助我們獲得這些處在城鎮中心的房子，儘管這將需要遷移那些每日都要去覲見領主人的房子（亦即並非是普通的老百姓）」；[154]「考克斯毫無顧慮地讓人們（日本人）搬離他們的房屋，從而它們可以被拆毀或者改造成倉庫」[155]——商館的擴

[151] 日本人也正是看重這些紅毛商人的弱點和軟肋而加以利用進行詐欺，將他們灌醉之後，脫光他們的衣服，拿走他們身上所有的錢物，然後把他們轟趕出去，或者直接就將他們關押起來，誇張或者偽造他們的債務以勒索和敲詐他們或者英國商館。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p. 328.

[152] ジョン・セーリス著，村川堅固譯，岩生成一校訂，《セーリス日本渡航記》，一六一三年八月六日，頁158。

[153] ジョン・セーリス著，村川堅固譯，岩生成一校訂，《セーリス日本渡航記》，一六一三年九月十七日，頁196-197。

[154]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 51.

[155] James Lewis, "'Nifon Catange or Japon Fation':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建以及英國商館與日本民居之間保留的緩衝區，是建立在拆除已有民宅的基礎上而實現的，換言之，就是以犧牲一些日本人的利益而達成的，因而這樣的建築和空白，本身就是一種矛盾和衝突的象徵。

四、結語

鑒於英國商館在日本的經營未達到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預期，1623年巴達維亞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弗斯蘭（Richard Fursland）向考克斯發出正式通牒，命令商館人員全部撤離。在考克斯以及從巴達維亞派往日本的全權代表科克拉姆（Joseph Cockram）聯名寫給平戶領主松浦隆信、幕府老中以及將軍的信函當中，委婉地表達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得不關閉在日商館的原因。首先是由於日本和巴達維亞之間海域充滿危險，僅在過往的三年之間就損失了兩艘前往日本滿載貨物的大船。其次是打開中國門戶的失敗，強調公司為了實現這一目的花費甚巨，而且日本商館能維繫到今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實現對華貿易的期望之上，然而這一希望已然變得渺茫。再者，也是最為直接的原因是，一艘從英國本土前往巴達維亞的船隻失蹤，其中裝載有諸多可在日本銷售的商品，由於此一不幸，公司無力繼續維持商館在日商業活動。[156]

在這幾封信函當中，英國人明顯地淡化了他們在日本所遭遇的困難，然而，在其輕描淡寫之下是波濤洶湧的對抗，言不由衷的表述包裹的是其不敢面對現實，是在內外交困的絕境當中才不得已選擇離開。英國商館從內部的經營和治理，到外部的與西葡荷的競爭，再到日本社會上至統治階層下到普通民眾之間的關係，各方面都潛藏著諸多問題。孤懸於東北亞的日本商館曾經背負了東印度公司從日本本土獲取充足貴金屬，用以減輕倫敦總部的財政壓力，進而跳脫英國政府對於公司可輸出貴金屬額度的限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p. 156.

[156] 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pp. 345-346.

制的期許；然而卻正是這份期許使得總部對於日本商館在必要資金的供給、商品的選送以及人員的配備等，都難以滿足現實的需求，以至於日本商館不僅未能反哺母公司，卻需要後者源源不斷的輸血。不斷邊緣化的日本商館墮入了惡性循環，最終遭到公司的徹底拋棄。日本商館內部因人員配置不足、個體素質參差不齊、重要「仲介者」之間的不和諧、紀律規範和宗教道德束縛的缺位，致使在日英國社群內部存在著一種難以扭轉的離心力，由內而外蠶食著英國人的凝聚力，進而限制著英國人在日開拓的步伐。

英國人與在日其他外國勢力多維度的競爭中，也是始終處於被壓制的劣勢地位，陷入「四」面埋伏的英國人舉步維艱。在日勢力已然根深葉茂的葡萄牙勢力對於後來者的英荷東印度公司嚴防死守，尤其是確保立基之本澳門——長崎之間大船貿易的安全與平順，並且聯合在日的西班牙人對於新教國家的宗教和政體進行批判、對新興的東印度公司的「準國家」特性進行攻擊，對英荷兩國之人在世界各地燒殺搶掠的海盜作風不斷地渲染，陷英國人於不義。此時初興的英國在與國力正值高峰的荷蘭共和國之間的競爭中更是幾乎受到全面壓制，在所謂的合作中暗流湧動，在直接的對抗中則是難以還擊。在軍事實力和貿易規模中屈居下風的英國人不僅在外交場合上不能遏制荷蘭人，而且在宗教態度上則更是難以與「能屈能伸」的荷蘭人匹敵。在與西方勢力的競爭中，英國人可謂是腹背受敵，最終敗下陣來。被館長考克斯賦予極高期望的「支那甲必丹」李旦也最終讓英國商館開拓對華貿易的企劃化為泡影。畢竟，以李旦為首的在日唐人社群在能力和動力兩方面都難以兌現他們對於英國人的承諾，反倒是令商館背上巨額債務，最終無法立基於中日貿易之上的英國商館喪失了與西葡荷競爭的本錢，也辜負了幕府的期望。

最後，在與日本本土社會的關係當中，英國商館也是陷入了困境。從德川家康相對開放包容的對外政策，到其繼承者德川秀忠保守化的轉變，日本最高統治者單方面的政策調整讓英國人措

手不及。既無法適應也無力改變，繼續堅持成為一種無謂的掙扎。加上英國商館所處的平戶藩的領主松浦氏對於轄地內的英荷之人無節制的索取，成為壓在本來就「先天羸弱」的英國商館身上無法承受之重，英國人不得不選擇退出及時止損。英國男性與日本女性之間的兩性關係、英國雇主與日本僕役之間的雇傭關係、英國新教徒與日本天主徒的關係，以及英國船員與平戶當地社區的關係等都風波不斷，英國人始終難以融入到本土的社會當中，其所經營的事業也因為這重重的緊張關係而難有突破，最終陷入到泥沼之中。

總體而言，英國商館在短短十年之後就選擇閉館，揚帆而去，失敗的原因是諸多的，絕非僅僅是在商業方面的表現。這種失敗是一種全面或綜合性的失敗，除了經濟運作的不良，其他的因素也相當重要，這些因素也是其商業挫敗的關鍵。

（責任編輯：林煒恩　校對：林家維）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明．方孔炤，《全邊略記》，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第14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

清．江日昇，《臺灣外紀》，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三編》，第9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清．黃宗羲，《賜姓始末》，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三編》，第8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清．劉獻廷撰，汪北平、夏至和標點，《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江樹生主譯、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I（1622-162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

利瑪竇（Matteo Ricci）、金尼閣（Nicolaus Trigautius）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永積洋子譯，《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三輯）——自一六三三年九月至一六三七年十月》，東京：岩波書店，1969。

永積洋子譯，《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四輯）——自一六三七年十一月至一六四一年六月》，東京：岩波書店，1980。

村上直次郎譯註，《增訂異國日記抄》，東京：雄松堂出版，2005。

ジョン・セーリス著，村川堅固譯，岩生成一校訂，《セーリス日本渡航記》，東京：雄松堂出版，1999。

Cocks, Richard.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0.

Farrington, Anthony.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1.

Murdoch, James. *A History of Japan (Vol II): During the Century of Early*

Foreign Intercourse (1542-1651). New York: Greenberg, 1926.

Purnell, C.J. ed. *The Log-book of William Adams, 1614-19: with the Journals of Edward Saris,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Japan, Cochin China, Etc*. London: The Eastern Press, 1916.

Rundall, Thomas, ed.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atow, Ernest M. ed. *The Voyages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 1613*.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00.

二、近人專書

李金明，《明代海外貿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顧良、施康強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世界的時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内山舜，《アダムスと家康》，東京：磯部甲陽堂，1926。

石一郎，《海のサムライ》，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3。

加藤三吾，《三浦の安針》，東京：明誠館書店，1917。

外山幹夫，《松浦氏と平戸貿易》，東京：国書刊行会，1987。

村上直次郎，《貿易史上の平戸》，東京：日本学術普及会，1917。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改訂增補）》，東京：六甲書房，1974。

武藤長蔵，《日英交通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78。

宮永孝，《日本とイギリス——日英交流の 400 年》，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

高瀬弘一郎，《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東京：岩波書店，1993。

Blacker, Richard. *The Needle Watcher: The Will Adams Story, British Samurai*. Rutland, Vermont and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Inc., 1973.

Boxer, C. 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Boxer, C. R., ed.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59.

Bruce, John. *Annals of the Honorable East-India Company from Their Establishment by the Charter of Queen Elizabeth, 1600, to the Union of the London and English East-India Companies, 1707-8*, Vol. I. London: Black, Parry and Kingsbury, 1810.

Dalton, William. *Will Adams, the First Englishman in Japan: A Romantic Biography*. London: Cassell, Petter and Galpin, 1868.

Games, Alison. *The Web of Empire: English Cosmopolitans in an Age of Expansion, 1560-16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Grantham, William Wilson and Alderman J. Bate, etc. *William Adams: The Pilot-Major of Gillingham, the First Englishman Who Discovered Japan*. Gillingham: Mackays, 1934.

Hildreth, Richard. *Japan As It Was and Is*. Boston: Phillips, Sampson and Company, 1855.

Laver, Michael.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Early Modern Japan: Gift Giving and Diplomac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0.

Markley, Robert.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ssarella, Derek. *A World Elsewhere: Europe's Encounter with Japa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Morse, Hosea Ballou. *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Paske-Smith, Montague. *A Glympse of the English House and English Life at Hirado, 1613-1623*. Kobe: J. L. Thompson & Co. Retail Ltd., 1927.

Paske-Smith, Montague. *Western Barbarians in Japan and Formosa in Tokugawa Days, 1603-1868*. Kobe: J. L. Thompson & Co. Ltd., 1930.

Rogers, Hiromi T. *Anjin - The Life and Times of Samurai William Adams, 1564-*

1620. As Seen Through Japanese Eyes. Kent: Renaissance Books, 2016.

三、近人論文

尤建設、吳佩軍，〈試論德川幕府時期日本與東南亞的朱印船貿易〉，《南洋問題研究》，2006：4，廈門，2006.12，頁88-95。

王煜焜，〈博弈與犧牲：近世初期德川幕府海洋政策特點〉，《海交史研究》，2018：1，泉州，2018.6，頁82-91。

任娜、陳衍德，〈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形成新論〉，《史學月刊》，2017：5，開封，2017.5，頁118-126。

多洛斯．弗爾克（Dolors Folch）著，戴娟譯，〈馬尼拉大帆船〉，收入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編，《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第 10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3-24。

李德霞，〈淺析17世紀上半葉日本「鎖國政策」對其外貿的衝擊〉，收入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中國博物館協會航海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編，《人海相依：中國人的海洋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77-88。

徐健竹，〈鄭芝龍、顏思齊、李旦的關係及其開發臺灣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3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286-301。

陳國棟，〈馬尼拉大屠殺與李旦出走日本的一個推測（1603-1607）〉，《臺灣文獻》，60：3，南投，2009.9，頁33-62。

張蘭星，〈17世紀初的英日貿易及其失敗原因〉，《史林》，2012：3，上海，2012.6，頁170-177。

張蘭星，〈論 17 世紀前期日荷貿易及其成功原因〉，《史學集刊》，2014：5，長春，2014.9，頁82-89。

張蘭星，〈初探 16-17 世紀澳門——長崎航線的葡萄牙巨船〉，收入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編，《絲路的延伸：亞洲海洋歷史與文化》，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193-211。

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3，臺北，1999.9，頁435-473。

劉欽，〈日英早期通商研究（1613-1623）〉，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

2018。

錢江著，亞平、路熙佳譯，〈古代亞洲的海洋貿易與閩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2，泉州，2011.12，頁1-51。

岩生成一，〈明末日本僑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東洋學報》，23：3，東京，1936.5，頁63-119。

皆川三郎，〈William Adams 研究——日英における評価と人間 Adams——〉，《英学史研究》，7，東京，1974.9，頁1-94。

Bassett, D. K. "The Trade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Far East, 1623-84: Part I: 1623-65."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1/2 (April, 1960), pp. 32-47.

Clulow, Adam. "From Global Entrepôt to Early Modern Domain: Hirado, 1609-1641." *Monumenta Nipponica*, 65: 1 (Spring, 2010), pp. 1-35.

Clulow, Adam. "Commemorating Failure: The Four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England's Trading Outpost in Japan." *Monumenta Nipponica*, 68: 2 (2013), pp. 207-231.

Farrington, Anthony. "The Japan Bas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Attempts at Inter-Asiatic Trade from Japan, 1613-1623." In *William Adams and Early English Enterprise in Japan*. Discussion paper for a symposium held by The Suntory and Toyota International Centres for Econom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No. IS/00/394, July, 2000, pp. 26-36.

Iwao, Seiichi. "Li Tan 李旦, Chief of the Chinese Residents at Hirado, Japan in the Last Days of the Ming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17 (1958), pp. 27-83.

Lewis, James. "'Nifon Catange or Japon Fation':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PhD Thesis from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04.

Massarella, Derek and Izumi K. Tytler. "The Japonian Charters: The English and Dutch Shuinjō." *Monumenta Nipponica*, 45: 2 (Summer, 1990), pp. 189-205.

Ogborn, Miles. "Writing Travels: Power, Knowledge and Ritual on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s Early Voyag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7: 2 (January, 2002), pp. 155-171.

Screech, Timon. "'Pictures (The Most Part Bawdy)': The Anglo-Japanese Painting Trade in the Early 1600s." *The Art Bulletin*, 87: 1 (March, 2005), pp. 50-72.

Screech, Timon.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Japan Review*, 24 (2012), pp. 3-40.

Veith, Ilza. "Englishman or Samurai: The Story of Will Adam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5: 1 (November, 1945), pp. 5-27.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Japan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Xiao, Fei-yan*

Abstract

In June 1613, the Clove, a merchant ship dispatched by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arrived in Japan, its mission to open up a trading post, or "factory," that would allow England to trade with Japan. Just ten years later, however, the factory was abruptly shut down. The English, who had arrived in Japan later than other European nations, were now also the first to leave. While previous scholars who have studied the issue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factory was closed due primarily to its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cannot focus on economic causes alone. The factory was not merely a trading post: it was also an important diplomatic, social, and military center. Its closure had to do with the strain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factory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headquarters back in Lond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factory and the Bantam Presidency in Java were also far from ideal. In addition, the factory was not on amicable terms with its Japanese hosts, or with other foreign powers in Japan. After the English left Japan, they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China.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would elapse before Anglo-Japan relations were restored.

Keywords: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okugawa Shogunate, Hirado Factory, Richard Cocks, Anglo-Japanese relationship

*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